

CDHK Chinesisch-Deutsches Hochschulkolleg
Tongji-Universität Shanghai



同濟大學中德學院

谁是中国乡-城暂时性迁移者？

——一个迁出地视角的实证文献综述

Who leave the countryside?

A review of empirical studies concerning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urban migrants in China

卢云鹤 (Yunhe Lu)

经济发展文论 Jingji fazhan wenlun
Arbeitspapiere für Wirtschaftsentwicklung
Working Paper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发展研究所
Institut für Wirtschaftsentwicklung
Institute for Econommic Development

国际标准刊号: ISSN-Nr 1860—2207

04/2008

目录

1. 引言和综述文献说明	4
1.1 文献综述的主要目的	4
1.2 关于综述文献的简要说明	5
1.3 迁移者定义及其与迁移选择性的关系	6
2. 谁是中国乡-城暂时迁移者?	7
2.1 国外迁移选择性文献: 一个参照系	7
2.2 中国乡-城暂时性迁移者特征的大致模式	8
2.2.1 迁移者的年龄选择性	9
2.2.2 迁移的性别选择性	10
2.2.3 迁移的婚姻状况选择性	11
2.2.4 迁移的教育选择性	11
2.2.5 迁移的收入选择性	13
2.2.6 迁移选择性模式: 总结	16
3. 对上述中国乡-城暂时迁移模式的检验	17
3.1 迁移选择性是随时间变化的吗?	17
3.1.1 检验一: De Brauw et al. (2002)	17
3.1.2 检验二: 都阳、朴之水 (2003)	18
3.1.3 检验三: 朱农 (2005) 第三章、何英华 (2004)	18
3.1.4 小结	19
3.2 不同迁出地的迁移选择性是相同的吗?	20
3.2.1 检验一: De Brauw et al. (2002)	20
3.2.2 检验二: Hare (1999)、李实 (2001)、赵耀辉 (1997)、何景熙 (1999) —— 迁移的性别选择性	20
3.2.3 检验三: 李实 (1999) —— 迁移的收入选择性	20
3.2.4 小结和猜想	21
参考文献	21
附录	23

关键词：乡-城劳动力迁移、迁移选择性

Keywords: rural-urban migration, migration selectivity

JEL: J61, J2, O15

作者/Author: 卢云鹤 (Yunhe Lu)

电子邮箱/E-Mail: luyunh0405@hotmail.com

内容提要

作为一个以中国乡-城劳动力迁移为背景的实证文献综述,本文试图回答如下问题:谁是中国的乡-城暂时性迁移者?他们具有怎样的人口、经济特征,他们的这些特征和农村非迁移者有什么显著区别。通过对文献的整理和归纳,本文总结出了一个典型意义上的中国乡-城迁移者的特征模式:迁移者比较年轻,以男性为主,多数迁移者已婚,他们的教育水平高于非迁移者,并且他们通常来自迁出地当地收入相对较低,但又不是最贫困的家庭。而这些特征和农村非迁移者有所不同。作者注意到,以上的迁移模式并不一定能够正确地反映出农村劳动者(及其家庭)的各种特征对于其迁移决策的影响。事实上,本文综述过的部分文献表明,已婚通常对迁移有负向影响或者无显著影响;教育对迁移的影响不一定总是显著的,影响的方向也不一定总是正向的,两者之间还可能存在倒U形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具有初中学历的劳动者迁移的概率高于其他组分。在本文的最后部分,作者采用本文综述过的部分文献,在尽量保证迁移者定义、调查时间和地点等要素可比性的前提下,从定性和定量两个层面讨论了前面总结出来的迁移者特征模式的稳定性和普适性的问题,即迁移者的特征是否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来自不同迁出地的迁移者的特征是否有所不同。总体而言,至少在定性的层面上,上述迁移者特征模式得到了证实,且迁移者特征在短期内可能保持相当的稳定性,但不同地区之间的迁移者特征可能差别很大,因此试图总结出适用于全国范围的迁移者模式的工作充满挑战。

谁是中国乡-城暂时性迁移者？¹

——一个迁出地视角的实证文献综述

1. 引言和综述文献说明

1.1 文献综述的主要目的

谁是乡-城迁移者²，他们具有怎样的人口、经济特征，他们的这些特征和农村非迁移者或者其他群体有什么显著的差异，这些问题是非常有趣和十分重要的，因此在国外、国内的劳动力流动相关文献中都经常被提及。作为一个以中国为背景的文献综述，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总结发表于1994-2008年上半年期间中国乡-城劳动力迁移相关实证文献中关于乡-城暂时性迁移者特征的大量但相当零散的研究成果，试图从中找出一个典型意义上的中国乡-城暂时性迁移者特征的模式。并且还将利用本文综述过的部分文献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来检验这一模式的稳定性和普适性，即考察迁移者的特征是否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来自不同迁出地的迁移者的特征是否有所不同。

与迁移者特征这一问题紧密相关，研究者还经常会探讨迁移决定因素(Determinants of migration)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在保持其他特征不变的条件下，劳动者的某一特征对其迁移决策是否有影响；如果确有影响，那么影响的方向如何，是促进了还是阻碍了劳动力的迁移（定性层面）以及影响的大小（定量层面）。在本文的附录一里，作者初步探讨了迁移者特征和迁移决定因素这两个问题的联系和区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两个问题及其使用的方法是相关的，因此出于简化文章表述的考虑，作者在后文将不再仔细区分两个术语，而是把它们统称为迁移选择性³(migration selectivity)问题；在文献综述的过程中，则分别从两个问题各自的角度共同但又有所区别地探讨迁移选择性在劳动者各种特征上的具体表现。

¹ 本文写作的过程中得到了同济大学中德学院胡景北教授、郑彩祥老师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当然文责自负。

² 本文不明确区分（劳动力）流动、迁移、转移等概念，如不特别说明，都是指暂时性迁移。

³ 迁移选择性 (migration selectivity) 通常是指：迁移者并不是随机地分布在人群中 (Migrants typically do not a random sample of the overall population)，他们有着区别于非迁移者的特征，这些特征主要是指能力、技能（理论文献的重点，不能被完全观察到）、教育水平和其他人口特征。这些特征通常直接或间接地和个人收入相关，从而影响迁移决策和迁移的后果 (Borjas, 1987; 朱农, 2005; 唐家龙、马忠东, 2007)。本文意义上的迁移选择性涉及的范围更广，包括劳动力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社区特征的选择性（完整的版本请参看本文附录二）。在本文综述过的文献中，多数文献发现仅有小部分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参与到了乡-城劳动力迁移中。如果排除掉少数参与率极高的例子，然后简单地对其余文献中的劳动力迁移率求均值和方差，可知平均有13%左右的劳动力参与到迁移之中，标准差为6%（具体迁移率数据可以参看本文附录二）。这些发现表明，在中国的乡-城劳动力迁移中可能存在着某种迁移选择性，某些农村劳动力比其他农户的劳动力或者自己家庭中的其他劳动力更早地向城市迁移。当然，我们可以设想这些劳动力之所以更早地参与到迁移中来，不是因为他们具有一些和其他劳动力不同的特质，而只是某种类似于随机抽签选择的结果。不过，本文正文部分的综述明确地否认了这一点。

1.2 关于综述文献的简要说明

本文综述的有关中国乡-城迁移选择性问题的论文（和专著）在 36 篇以上⁴，其中大部分为中文文献，也有部分英文文献（篇目和部分内容来自赵忠，2004 等）；主要是经济学文献，也包括了部分人口学、社会学文献。相比现有的海量劳动力流动方面的文献，本文综述的文章可谓沧海一粟，作者选择这 36 篇文献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1）绝大多数文献来源于学术期刊和专著，因此其保证调查数据的真实性、研究过程的规范性以及结果的可靠性；（2）作者根据本文的题目和主要目的对相关文献进行了取舍：本文是实证文献综述，因此没有涉及相关理论文献和政策讨论；本文探讨的是迁移，而迁移与其他非农劳动存在着一定的差别，见赵耀辉（1997）等，因此一些讨论非农劳动而没有具体针对迁移的文献没有进入本文综述的范围⁵；本文的迁移是指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迁移，而不是讨论劳动力或农户的迁移意愿，所以作者对为数不少的有关迁移意愿的文献没有加以讨论；本文讨论的主要是暂时性迁移，在本文的背景下往往也可以理解为非户口迁移，关于永久性迁移或户口迁移的文献本文很少涉及，对于举家迁移的文献本文也没有涉及；如副标题所言，本文是一个迁出地视角的综述，关注于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在迁出地的情况，因此大量城市迁入地视角的文献本文没有涉及。

本文通过文献综述的方式集中探讨了乡-城迁移中的选择性问题，但是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不可能脱离迁移发生的大背景。迁移发生的时间不同，迁出地（和迁入地及其组合）不同，迁移的选择性则完全有可能不同。因此，这里我们需要事先按照迁移发生的时间和空间两个基本的维度对这些文献做一个大致的分类。

根据实证研究所使用数据的调查年份排序，可以发现调查年份最早的研究当属蔡昉（1996）。该论文利用 1990 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研究了 1985-1990 年期间全国范围内的劳动力迁移情况和迁移的影响因素；胡枫（2006）则使用了 2006 年春节期间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农户问卷调查数据，是本文综述的文献中调查时间最晚的一篇。可以看出，本文综述的文献的调查时间前后相距 16 年，基本上与改革以来中国乡-城劳动力流动的过程同步；但是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迁移的选择性模式很可能会发生变化，因此简单地把调查时间相距十多年的文献不加以区分地综述，可能导致不正确的结论，这点需要我们注意。此外，通过对于各篇论文使用数据的调查时间和论文发表时间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乡-城劳动力转移的研究从上世纪 90 年代至今大致经历了两次高潮：第一次发生在 1994/95 年前后，在此期间不同的研究机构、政府部门等进行了众多的劳动力迁移相关调查，积累了大量宝贵的资料，并且在此后几年里陆续产生出一批以上述调查资料为基础的研究成果，如李璠、赵树凯、张晓辉、周其仁、李实等分别对全国范围内（或者多个省份）劳动力转移情况的研究；杜鹰等在安徽、四川两省所作的调查报告以及赵耀辉在此调查基

⁴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在正文部分作者并没有明确地提到所有的 36 篇文献。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本文的附录二。

⁵ 本文参考了陈玉宇、邢春冰（2004）、邢春冰（2006）关于上世纪 90 年代（1991、1993、1997）中国九省市农村地区劳动力获得工资收入的决定因素的系列研究。需要注意的是，农村劳动力获得工资收入并不代表他们已经向城市部门转移了。陈玉宇的研究表明，在调查年份中，有工资收入的劳动者的比例保持在 30% 左右，而同期样本中仅有 18% 左右的劳动力在年内外出过，其余部分全年在家居住。邢春冰（2006）也表明，如果定义年内在外居住一个月以上的劳动力（1997 年数据中直接报告了劳动力的就业类型）为外出打工者（或者称之为迁移者），则他们的比例在 20% 左右，也低于有工资收入劳动者的比例。

础上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外来女劳工课题组对湖南钟水村外出打工情况的村级个案研究，Hare 和赵树凯在河南省夏邑县所作的农户调查及其研究论文等等。第二次研究高潮出现在 2000 年以后。利用 2000 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研究者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研究了九十年代后期中国劳动力迁移问题，本文综述的这一时期的文献包括何英华（2004）、王格玮（2004）、周皓（2007）和唐家龙等（2007）。相比前一次研究高潮，此时的调查方法、数据质量和研究手段都有了很大的改进。

同时，本文综述的文献中所研究的乡-城劳动力流动现象实际上是在中国的不同地域（之间）发生的。按照调查涉及地区（迁出地）的多少，可以把这些文献粗略地划分为以下几组：(1) 利用全国普查数据、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研究；(2) 利用涉及多个省份的农户抽样调查数据的研究；(3) 利用涉及单一省份抽样调查数据的研究；(4) 县、乡、村级的个案研究。通常来说，利用全国数据或者多省数据的研究代表性最好，从中可以比较容易地推断出全国范围内劳动力迁移的情况。但是一方面这类研究数量较少，调查的间隔时间很长，且调查不一定能够完全满足劳动力迁移及其选择性研究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全国各地农村的情况差异很大，乡-城迁移的流向也各不相同，因此迁移的选择性也完全可能随着地域变化而变化。是否存在着在全国范围内都在一定程度上适用的模式值得推敲。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常常需要用单一省份的研究或者是个案研究来补充以至修正前者的结论。

1.3 迁移者定义及其与迁移选择性的关系

在正式讨论迁移选择性之前，有必要简要地讨论一下迁移（者）的一般定义和在本文将要综述的中国乡-城劳动力迁移文献中的具体表现形式。根据联合国对于迁移和迁移者的一般定义，迁移通常是指在一段时期内（人口）居住地的变动；迁移者是指一段时期内常住地发生变化的人 (UN, 1970: *Methods of measuring internal migration*, 转引自Greenwood, 1997)；为了使得迁移者定义更具有操作性，便于估计迁移规模，在迁移者的定义中通常还会对迁移的空间范围或距离下限、迁移者在迁入地工作、生活的时间下限等做出具体规定。例如美国的许多统计机构把迁移定义为人口在调查之前 1~5 年从其他辖区（通常是县）迁入本地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88, 转引自Greenwood, 1997)。在中国的各种统计机构、政府、研究机构主持的人口或者劳动力流动调查中⁶（如本文综述的许多文献），迁移地域范围并不统一，常见的包括村外、乡（镇）外、县外、乡外省内、省外等；与许多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乡-城迁移往往呈现出暂时性或者周期性(cyclical)的特点，因此迁移者定义中迁移时间的下限往往规定的短一些，本文中常见的时间内限有一个月、三个月、半年⁷。另外，由于户口制度的原因，中国的乡-城迁移又可以被划分成两个差异较大的部分，即户口迁移和非户口迁移，本文基本上讨论的是非户口迁移。

为什么要在这里讨论迁移者的定义呢？主要原因很明确：不同定义之下的迁移者完全可能具有不同的特征。不同定义下的迁移者的特征很可能不能简单地进行比较，因此通过考察不同定义下的迁移者的各项特征总结出迁移者的共同特征或者选择性模式的方法可能是有问题的。以下举几个本文将要综述的文献中的例子说明。

⁶ 中国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历次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中迁移劳动者的定义可以参考：段成荣，我国流动人口统计口径的历史变动，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官方统计调查中迁移者定义的历经了多次变化。关于 1990 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和 2000 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中使用的迁移者定义将在后文 3.1.3 节说明。

⁷ 其他的时间下限包括连续十天、四个月、一年等。

由不同的时间限定（结合空间限定）所定义的“迁移者”可能具有不同的特征，迁移选择性有所不同。赵耀辉（1997）把迁移者定义为上年外出三个月以上的劳动力；而非农劳动者被定义为外出但外出时间在三个月以下的劳动力。在这样的定义下，迁移者和非农劳动者在许多特征，如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所在社区的交通情况等方面存在区别。如果我们改变上述定义，放松定义中的时间限定，比如改为一个月，连续十天或者像本文综述的许多文献那样把外出时间下限确定在一天，那么可以合理地推测按照原来的定义属于非农劳动者的劳动力中的很大一部分会由于这种定义的改变被重新归入迁移者。那么，在新的时间限定下的“迁移者”很可能和原来定义下的迁移者有着不尽相同的特征，迁移选择性发生改变。

类似地，有不同空间限定（结合时间限定）所定义的“迁移者”也可能具有不同的特征，迁移选择性有所不同。例如，何英华（2004）利用五普数据讨论了省内、省际非户口移民的特征。描述统计表明省内、省际非户口移民在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比例等方面存在着差异。胡枫（2008）也表明省内和跨省流动的农村劳动力的某些特征有所不同。如果以上关于省内、省际移民特征差异的结论可以适当外推的话，我们应该可以预见乡外县内、县外省内等移民的特性或者迁移选择性也会有所不同。

此外，户口迁移和非户口迁移者的许多特征也存在较大差异，这已经为中国乡-城劳动力迁移的众多文献所证实（例如：何英华，2004；唐家龙，2007等）

由此可见，在文献综述时我们应该注意不同文献中迁移者定义的可比性，并且尽量在保证定义可比性的前提下总结出迁移选择模式。但是遗憾的是，本文综述的文献数量较少，且定义上不统一，变化繁多，因此希望通过只比较相同或者近似定义下的迁移者特征从而总结出迁移选择性模式可能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由于上述实际困难，本文下面的部分将在忽略迁移者定义可比性的前提下总结出典型意义上的乡-城迁移选择性模式，只是在本文最后的部分，在检验已经得到的迁移选择性模式是否具有稳定性和普适性的时候，才会再次考虑迁移者定义的可比性问题。

2. 谁是中国乡-城暂时迁移者？

2.1 国外迁移选择性文献：一个参照系

在讨论中国背景下的乡-城迁移选择性之前，我们可以首先考察一下国外文献（主要是英文文献）中对迁移选择性问题的研究及其结论，并把它们作为中国背景下研究的参照系。当然，相关领域的外文文献数量惊人，因此这里采取折衷的办法：对一些非常优秀的劳动力迁移领域的英文文献综述做再整理。在再综述的过程中，我们特别关注这些文献在哪些方面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对迁移选择性问题的达成了一致，在哪些方面还存在着分歧，我们也关注与上述共识不相符的例外情况。

通过对发达国家人口迁移研究的综述，Greenwood (1997) 得到了发达国家迁移者的一些基本特征，它们也是众多研究者在迁移选择性问题上达成的基本共识。首先，Greenwood 指出迁移与年龄的关系是普遍存在的，迁移倾向在人生的前二十多年中达到其峰值，然后逐渐下降；然后，迁移和教育水平的关系同样是普遍存在的，通常迁移倾向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上升。

R.E.B.Lucas (1997)引述 Todaro (1980) 关于发展中国家人口迁移研究文献综述

的结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迁移者同样是以年轻人为主，且劳动者向城市迁移的概率与其受教育水平正相关。此外，乡-城迁移中可能存在着性别不平衡 (gender biases) 和婚姻状况不平衡的现象。Williamson(1988)对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和上世纪70年代第三世界城市化进程的对比研究支持了 R.E.B.Lucas 和 Todaro 的前两点结论，Williamson 发现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地区的“智力外流 (brain drain)”现象，认为“流入城市的那些迁移者不仅年轻，而且可能也是农村劳动力中最优秀和聪明的部分”。

总结上面Greenwood对发达国家、Todaro, R.E.B. Lucas对发展中国家迁移选择性的观点，我们发现国外研究者们已经在年龄和教育等因素对迁移的影响，或者说迁移者的年龄、教育选择性方面取得了一些共识。但是正如Greenwood (1997)⁸所总结的那样，研究者们通常只是在定性研究层面上取得了上述共识，如果进一步地在定量层面上考虑年龄、教育和迁移决策的关系，即使保证了研究方法和数据的可比性，研究者们也很难再取得一致意见。

我们还应该看到，即使在定性水平上，也存在着一些违反以上定性共识的例外情况。在不同的国家里，迁移和个人因素（教育、性别等）的关系也可能是不同的。反例列举如下：

教育与迁移的关系：Lipton⁹的研究表明，在亚洲地区很多迁移者是没有技术，家里没有多少土地的贫农。Todaro (1980) 记录了在非洲许多地区普遍存在的“辍学 (school leaver)”迁移者现象。Walker (2008) 表明，在一次对美国年轻人迁移行为的调查中，教育和迁移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出U型，高中学历的年轻人迁移比例最低，具有大学或者高中以下学历的年轻人迁移率更高。

性别、婚姻状况与迁移的关系：Todaro (1980) 表明，在不同地区存在着迁移者性别、婚姻选择的不同模式。在亚洲和非洲迁移者以未婚男性为主，在拉美地区迁移者以未婚女性和已婚男性为主。而且即使在同一地区内部情况也不尽相同。

2.2 中国乡-城暂时性迁移者特征的大致模式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乡-城劳动力迁移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社会经济现象，引发了理论界热烈、持续和不断深入的讨论。二十多年来，国内外的研究者对这一重要现象作了大量调查研究，许多研究得出了很有价值的结论。然而，在本文写作的过程中作者逐渐认识到，直到现在我们仍然很难认为我们对于中国的乡-城迁移现象有了完备的认识，对于迁移者的特征或者迁移决定因素这个基础性的问题做了充分的研究。事实上作者发现，中国乡-城迁移领域的研究者在“谁是迁移者”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尤其在关于迁移者的教育水平、迁移之前家庭的收入情况等方面，研究者之间甚至连定性层面上的共识也没有达成。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不同作者所做的文献综述中发现这些分歧。例如：蔡昉等（2003）认为，“许多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转移最多的并不是最贫困的地区，也不是最贫困的农户”，相反迁移者的“家庭经济状况通常在其家乡处于中上等水平”；而张永丽、黄祖辉（2008）则持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流动者基本以寻求职业，增加收入为目的，主要来自低收入地区的中等偏低收入农户”。至于迁移者的教育特征以及教育对

⁸ 原文中这一结论不仅仅适合于谁是迁移者和迁移决定因素的讨论。

⁹ 转引自Todaro(1980)

于迁移的影响等问题，研究结论中存在的争议就更多更复杂了。

因此，在本文接下来的部分里，作者将把焦点集中在“谁是中国乡-城暂时迁移者”这个专题上，试图通过对 36 篇文献的综述，大致勾勒出中国乡-城暂时迁移者的特征。如果在某些方面研究者之间存在较大分歧，作者也会尽量表明这些分歧。在文献综述的过程中，作者还会适时地把中国乡-城迁移者的特征和前面部分英文文献综述的基本结论进行对比。需要说明（重申）的是，在这部分里通常作者暂时不考虑迁移发生的时间、地区等因素（以及迁移者的定义）对迁移选择性的影响。

下面作者通过文献综述的方式，逐一讨论迁移者的各种特征，或者说迁移选择性在各种特征上的具体表现。在对每一种迁移者特征综述的过程中，作者都交替讨论了采用两类实证方法，即描述统计和计量经济学模型（常见的有Logit, Probit, OLS等，一半左右的文献采用了各种Logit, Probit模型）的研究文献的结论¹⁰，两者之间的一些联系和区别可见附录一。由于时间的限制，本文接下来的正文部分仅仅考虑了迁移者在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和（迁移前）其家庭的收入情况等特征，关于迁移者的其他特征，读者可参看本文的附录二。

2.2.1 迁移者的年龄选择性

迁移者的年龄特征或者说迁移人群的年龄构成情况是此类文献中最频繁地被提到的问题。以本文综述的 36 篇文献为例，几乎所有的文献都涉及了这一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基本的结论是：迁移者以年轻人为主，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在某个年龄之后），劳动者的迁移概率逐渐下降。这与前面外文文献综述的结论一致。

2.2.1.1 迁移的年龄选择性：描述统计文献

基本上所有的描述统计研究都证实了如下观点：迁移者以年轻人为主。根据本文综述的文献来看，35 岁以下的青壮年构成了迁移者的主体，通常占到了迁移者总数的 60% 以上，某些研究中这一比例超过了 80%。劳动力的迁移频率通常在 20~30 岁之间达到最大值¹¹；迁移者中这一年龄组占的比例往往也是最高的。与非迁移者相比迁移者要年轻一些¹²，迁移者和非迁移者的年龄差距通常在 10 岁以上。

2.2.1.2 迁移的年龄选择性：计量经济学模型

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主要是Logit, Probit模型）研究者们通常发现，年龄对迁移概率有负向影响或者两者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即劳动者¹³的迁移概率在某一年龄达到最大值，此后迁移概率下降。

在前一种情况下，部分研究者报告了年龄对迁移的负边际影响的具体数值。年龄的边际影响通常不大，经济意义不够显著，如赵耀辉（1997），Zhao (2001)；与描述统计结果一致，通常发现 20 岁左右的劳动力迁移概率最高。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调查时间、地点以及其他研究方法上的差别，迁移概率达到峰值的年龄在不同研究中差别很大，例如朱农（2002）发现，48 岁的男性劳动力迁移概率最高；而王格玮（2004）表明男性迁移概率在 21 岁达到最大。蔡昉等（2002）和王格玮（2004）调查时间接近，且迁移者定义接近，可比性稍好。它们说明在 2000 年前后迁移概率

¹⁰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做的主要工作是对文献中已经提供的实证结果进行整理和总结，必要的时候重新解释文献的结果。至于文献中的具体实证方法问题以及不同实证文献结果的可比性问题作者考虑较少。读者可以参考赵忠（2004）的综述和王格玮（2004）。

¹¹ 迁移概率更可能是在 25 岁之前达到最大值，如何景熙（1999）、都阳等（2003）、唐家龙（2007）等。

¹² 粗略计算得到本文综述过的文献中的迁移者年龄的均值为 29 岁。

¹³ 根据一般的定义，劳动者的年龄在 15 或者 16 岁以上。本文综述的文献大多采用了以上的定义。

通常在 20 岁以后达到峰值，且峰值年龄可能和劳动者的性别有关。

2.2.2 迁移的性别选择性

在中国乡-城劳动力流动的文献中，性别和迁移的关系被广泛但通常很简略地研究着。在本文综述的某些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劳动力的性别对其迁移决策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2.2.2.1 迁移的性别选择性：描述统计

本文综述的几乎所有研究都支持了中国乡-城迁移者以男性为主的观点。但是在不同的研究中男女性别比例相差悬殊。如果根据外出人数计算迁移者的男女性别比例，最高的超过了 10:1 (Hare, 1999)，最低的仅仅为 1.03:1 (朱农, 2004)。由于男性迁移者在外打工的时间可能长于女性迁移者，所以按照外出打工天数来计算的迁移者男女性别比例的数值可能更大一些¹⁴，例如李实对山西省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研究表明，按照外出人数计算的男女性别比例为 6.8:1，而按照外出天数（外出人数×平均外出天数）计算的男女性别比例高达 48:1。不同文献中迁移者的性别比例即迁移的性别选择性差别如此之大，可能是由于不同研究者采用了不同的迁移者定义，也可能与迁移发生的背景，例如迁出地特性、迁移发生的时间或者迁入地的劳动力需求特点有关。例如，外来女劳工课题组对湖南郴州某村的个案调查表明，在当地的某些县，外出打工人员中女性的数量多于男性，这与当地外出劳动力的主要迁入地是广东省，而当地的用人单位一般招收女工有关。Hare 根据 1995 年对河南省夏邑县的调查发现，当地的外出劳动力中男性占绝对优势（91%），这可以用绝大多数外出劳动力进入建筑业、制造业和采矿业来解释。

同时应该看到，在中国的某些地区迁移的性别选择性并不明显。例如朱农（2004）、何景熙（1999）对中国南方一些省份农村劳动力的研究表明，这些地区迁移者中男女迁移者的数量相差并不大或者男女的迁移概率的差距实际上很小。何英华（2004）对 2000 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所做的分析也表明，省际非户口移民¹⁵性别的迁移选择性不很明显，其男女性别比仅为 1.12: 1，而所有的非户口移民的男女性别比例还要更低一些。关于迁移群体性别构成在不同地区差异很大这个事实，将在本文的下一部分进一步讨论。

2.2.2.2 迁移的性别选择性：计量经济学模型

计量经济学模型通常表明，男性的迁移概率高于女性，但是和描述统计的情形类似，性别对迁移概率的边际影响在不同的研究中相差很大，例如 Hare 的研究发现，男性的迁移概率比女性高出 30%；赵耀辉（1997）发现，男性的迁移频率高于女性 5%；Zhao (2001) 研究新近迁移者的迁移选择时虽然发现了男性的迁移概率较高，但其边际影响仅为 1.3%。在另外一些文献中，研究者并没有发现男性和女性在迁移决策上存在显著差异，例如朱农（2004）。

Hare(1999)在用 Probit 模型研究了劳动力的性别对其迁移概率的影响之后，运用持续时间模型研究了性别对迁移时间的影响。他的研究表明，性别是常见的人口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和受教育程度等）中唯一一个对迁移的持续时间

¹⁴ 另外一些文献发现男性迁移的持续时间比女性短，见 Hare, 1999。

¹⁵ 省际非户口移民和乡-城暂时迁移者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很重要的一点，省际非户口移民还包括城市之间的移民，这可能也是造成省际非户口移民的男女性别比例较低的原因之一。至于为什么这里把省际非户口移民或者省内省际非户口移民作为乡-城暂时迁移者的替代概念看待，作者的解释可以在本文附录二中找到。

有显著影响的变量，且男性的迁移时间比女性短。

2.2.3 迁移的婚姻状况选择性

相比迁移群体的年龄和性别特征，研究者对于迁移者的婚姻状况的关注少了很多，在本文综述的文献中，仅有不足一半的文献考虑了这个问题。在讨论迁移群体的婚姻状况时，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区分迁移群体中未婚者所占的比例和未婚劳动力的迁移倾向这两个概念。

2.2.3.1 迁移的婚姻状况选择性：描述统计

在本文综述的文献中，迁移者中已婚者的比例通常接近或超过 50%。这很可能是因为在农村的所有劳动力中，已婚者的数量远超过未婚者，因此即使已婚者的迁移率低于单身者（见何景熙，1999；唐家龙等，2007），迁移者中已婚者的绝对数量仍然高于未婚者。在某些研究中，迁移者中已婚者的比例超过了 80%（如胡英，2001；唐家龙等，2007）。另有一些研究表明，在某些地区未婚者构成了迁移者的主体，例如蔡昉等（2002）发现西部四个贫困县的迁移者中未婚者占到 82%。

2.2.3.2 迁移的婚姻状况选择性：计量经济学模型

对婚姻和迁移关系的计量经济学研究表明：婚姻通常对迁移有负向影响或者婚姻对迁移无显著影响。和前面对迁移的性别选择性的综述类似，婚姻对迁移的边际影响大小差异也很大。如蔡昉（2002）发现，2000 年前后在中国西部的四个贫困县，婚姻对迁移有很强的负向影响，已婚者的迁移概率比未婚者低 41%。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对比同一研究中其他常见变量对迁移的边际影响。同一研究中，保持其他因素不变，男性比女性的迁移概率高出 2.3%；增加 1 年教育，迁移概率也仅仅提高 0.36%¹⁶。这说明，在当时、当地婚姻状况对于迁移的影响是极其重要的，其重要性超过了研究者通常关注的其他人口因素、人力资本因素，如教育年限等。当然，具体是当时当地什么样的因素（或者是研究者的研究方式）使得婚姻具有这样重要的作用，我们还不得而知。

2.2.4 迁移的教育选择性

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常见的如正规教育等对迁移的影响是相关文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问题之一。与年龄、性别和婚姻状况等人口变量不同，教育对迁移的影响常常被作为文章的研究重点。遗憾的是，尽管研究者在这一领域做了许多的工作，并且产生了一些优秀的成果，但是对于中国乡-城劳动力迁移背景下的教育选择性问题的，研究者们并没有形成比较一致的看法。

2.2.4.1 迁移的教育选择性：描述统计

根据本文综述的文献，迁移者中具有初中文化水平者比例最高，通常超过 50%，他们构成了迁移者的主体¹⁷。其次是具有高中文化或者小学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总的来说，迁移者的受教育程度高于非迁移者。具体表现在迁移者中具有初中、高中文化水平的劳动力比例均高于非迁移者的相应比例；迁移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长于非迁移者。例如：白南生等（2002）比较了安徽、四川两省迁移者（仍在外出）和非迁移者（从未外出）的受教育程度，他们发现迁移者中具有初中学历的比例高达

¹⁶ 根据蔡昉等（2002）提供的数据可知，当地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约为 5 年，标准差为 3.2 年。据此可以推算出，即使当地平均教育水平提高 3.2 年，迁移概率也只上升不足 1.2%，仅相当于当地迁移率的 7%。

¹⁷ 根据蔡昉等（2003）转述的一项大型调查研究的结论，“初中学历是异地转移的足够条件”，这一点也得到了相当多文献的证实。

65%，具有高中学历的比例为 12%，均高于非迁移者中的对应比例，且迁移者的受教育年限为 8.6 年，长于非迁移者的 5.5 年。周其仁（1997）、赵耀辉（1997）等文献得到的结论和白南生（2002）基本一致。

一部分文献中还给出了不同学历劳动力的迁移频率。张晓辉等（1999）、李实（2001）、何景熙（1999）表明，随着学历的提高，劳动力的迁移频率也不断提高；唐家龙（2007）、都阳等（2003）则表明，学历和迁移频率之间存在某种非线性的关系。例如，唐家龙利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1998-2000）发现，初中学历的劳动力临时迁移率最高，高中学历劳动力的迁移率略低于初中学历；都阳发现在中国西部四个贫困县，1997 年和 2000 年初中学学历劳动者的迁移率通常最高，但是这期间高中学历者的迁移频率有所增加。

2.2.4.2 迁移的教育选择性：计量经济学模型

前面已经提到，国外的关于劳动力迁移的实证研究通常表明：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对迁移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其迁移的可能性就越大。在本文综述过的文献中，赵耀辉（1997）¹⁸是第一篇利用中国农户调查数据对上述命题进行检验的文献。她的研究发现，在中国（四川）的特定背景下上述命题不再成立。首先，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对迁移的影响很小，经济意义不明显。“同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相比，受过小学和初中教育的人的外出概率比较高”，但是仅仅高出约两个百分点；其次，并不是劳动力受教育的水平越高，其迁移的可能性就越大。研究表明，高中文化程度的人的外出概率不仅低于初中、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和没有上过学的人差不多（差别在统计上不显著）。赵对上述实证结果也感到很意外。在该文献中，作者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更倾向于进入本地非农部门工作而不是外出务工来解释上述发现。

那么本文综述的其他文献中的结论如何，是证实了赵耀辉（1997）的发现，还是支持了传统的观点，即教育对迁移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教育水平越高，其迁移概率越高呢？

I. 教育对迁移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吗？

从文献综述的结果来看，只有一部分实证文献证实了教育对迁移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如 De Brauw et al., 2002 等），其他文献则不支持上述观点。一些文献发现，教育对迁移无显著影响。例如，朱农（2002）发现教育虽然提高了男性劳动力的迁移概率，但对女性劳动力的迁移无显著影响；李实（2001）对山西农村女性劳动力流动的研究没有发现教育对女性外出有任何显著影响；Hare（1999）不仅没有发现正式教育对迁移概率有显著影响，也没有发现正式教育对迁移持续时间有显著影响。另外一些文献，例如蔡昉等（2002）、都阳等（2003）¹⁹对西部贫困地区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得到了和赵耀辉（1997）类似的结论，研究者虽然发现了教育对劳动力外出有正向影响，但是其边际影响很小。除此之外，一些研究甚至还发现（家庭平均）教育水平对迁移有一定的阻碍作用。Zhao（1999b）发现家庭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1 年，迁移概率会下降 0.7%；庞丽华（2001）也发现了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对省际迁移有负向影响。

II. 教育水平越高，外出概率就越高吗？

¹⁸ 或者 Zhao 1999a, Labor migration and Earning differences: The Case of Rural China.

¹⁹ 都阳、朴之水（2003）没有提供边际影响，所以只有根据回归系数大致判断其边际影响的大小。

在相关实证文献中，研究者通常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衡量劳动者的教育水平。第一种方式是用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来表示他们的教育水平，这种情况下教育水平可以看作是连续变量；第二种方式用劳动力的学历来表示他们的教育水平，这种情况下教育水平是一组离散的 0-1 变量。为了方便叙述和比较，下面分别说明。

a. 当教育水平用连续变量表示时

De Brauw et al. (2002) 通过对六省农村劳动力 1981 至 2000 年的（非农）就业史的研究发现，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1 年，他们的迁移概率会增加原有水平的 16%；Yao (2001) 发现，家庭最高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1 年，则家庭迁移天数增加 6 天，相当于平均迁移天数的 27%。当然，前面提到的 Hare(1999)，Zhao(1999b)也使用了连续的教育水平，但是他们没有发现教育水平越高，外出概率越高的关系。

b. 当教育水平用离散变量表示时

除了把教育水平表示为连续变量外，还可以把教育水平表示为一组离散的 0-1 变量，分别代表不同的学历，常见的如小学、初中、高中等。一部分实证文献发现，学历对迁移有正向影响，即学历越高（受教育年限越长），劳动者迁移的可能性越大，高中组的迁移概率高于初中组和其他组分。例如，朱农（2002，2004）发现，教育提高了男性的迁移概率，高中和以上组迁移概率最高²⁰；王格玮（2004）表明，教育程度的提高增加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迁移的概率。

另一些文献得到了不同的结论，他们发现教育和迁移之间存在倒 U 形关系，如 Zhao(2001)发现教育对迁移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初中教育对迁移的促进作用最大。程名望等（2006）、谢正勤等（2006）发现了类似的关系。这些研究结果印证了赵耀辉（1997）的发现。

2.2.5 迁移的收入选择性

在多数情况下，乡-城迁移的主要目的是经济目的。具体地说，劳动力在农村、城镇或从事农业劳动和非农劳动的收入差距是迁移的主要动因。通常我们会假定，劳动力（及其家庭）是理性的，它们总是尽可能地最大化其利益，比如最大化其收入²¹。由于城乡之间、农业劳动和非农劳动尤其是农业劳动和现代部门劳动之间客观存在的收入差距，劳动力必将重新配置其劳动，把更多的劳动投入到收入更高的城市地区和现代部门，从而引发了乡-城劳动力迁移。本文讨论的中国的乡-城暂时性迁移也不例外，朱农（2005）和何英华（2004）分别利用两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所做的研究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朱农（2005）对 1990 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的分析表明，61.7%的乡-城暂时性迁移者的迁移目的是务工经商；何英华（2004）基于 2000 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分析表明，在省际农村到城镇的非户口移民中，87.5%的移民以务工经商为主要目的。

以经济原因为主要目的的乡-城劳动力迁移，往往会反过来影响迁移者本人及其家庭的收入状况（最直接的途径如汇款）以及迁出地农户之间的收入分配状况。因此，在研究劳动力迁移对迁出地农户间收入分配的影响时，迁移的收入选择性就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迁移的选择性直接影响到迁移后的收入分配变化情况

²⁰ 但是从回归系数上来看，初中教育对迁移概率的提升作用最为明显。注意，以上的结论只是建立在系数的简单比较上。我们说高中组的迁移概率高于初中组，仅仅是因为高中组的回归系数大于初中组。至于两个组分的迁移概率是否在统计意义上是有差异的，根据文献中给出的回归结果我们无法判断。

²¹ 不同的理论中假定劳动者追求的目标有所不同，例如绝对收入、预期收入、各种形式的净收入、效用等。

²²。不妨设想一种最简单的情况，同一个村庄中，如果城市部门的工资高于农村部门且外生给定，但城市部门提供的工作机会有限，那么迁移的劳动力都来自高收入家庭（迁移的收入正选择）、迁移劳动力都来自低收入家庭（迁移的收入负选择）或者其他选择性完全有可能导致迁移之后截然不同的农户间收入分配状况。

尽管迁移者及其家庭的收入状况对于迁移的影响（及其反作用）十分重要，但是由于实证方法和实地调查中的困难，对于中国背景下的迁移的收入选择性问题的研究数量很少，在本文综述的文章中仅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文章或多或少地涉及了这个问题。下文将利用这些资料并且结合一些合理推测对中国乡-城迁移者及其家庭在迁移之前的收入水平进行说明。

2.2.5.1 文献综述结果：描述统计

在本文综述的文献中，提供了迁移发生之前迁移者家庭收入状况的描述统计分析的文献数量很少，且研究者所使用的收入定义也有很大区别²³，这给文献综述和迁移的收入选择性的讨论造成了一定困难。在本文综述的文献范围内，多数研究者直接使用了调查所得的迁移户和非迁移户的人均或者劳均收入数据²⁴，即迁移已经发生之后的收入数据，例如：朱农（2004）、张晓辉等（1995）、李实（1999）、都阳等（2003）²⁵、时金芝（2004）。应该注意到在迁移发生之后，由于迁移者向其他家庭成员的收入转移以及迁移造成的农业收入变化，使得迁移后迁移户的收入和迁移前已经不相同了。如果希望了解迁移的收入选择性情况，必须对根据迁移后收入数据所做出的结论进行必要的推断和调整，以反映迁移之前的收入情况。在本文综述的文献中，杜鹰（1997）采取了如下方法对迁移后收入进行了调整：研究者将迁移后的收入直接减去外出的收入从而得到迁移之前的收入情况。仔细考虑会发现这种方法是存在缺陷的，由于没有考虑到迁移者迁移前的务农收入（以及其他劳动力务农收入的变化），这种方法倾向于低估迁移户迁移前的收入水平。

在劳动力的迁移决策是理性的，以追求更高的收入为目标；劳动力相对于其家庭土地过剩；迁移不会带来家庭之间的土地重新分配等常见的假设下，本文作者对朱农（2004）、李实（1999）、都阳等（2003）等根据迁移后收入得出的一些结论作了调整，方法见后面的例子，通常的结论是：迁移者发生之前“迁移户”的人均收入低于“非迁移户”，或者说在平均意义上，迁移者通常来自于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群体。类比Borjas的说法，我们也可以把迁移者通常来自于迁出地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群体的现象称之为迁移的收入负选择（negative selectivity）²⁶。杜鹰

²² 当然，迁移的其他选择性，例如年龄、教育的选择性等也完全有可能影响到迁出地农户间收入分配的情况，而且通常根据调查数据我们只能知道迁移选择性的其他方面，但是迁移的收入选择性对最终收入分配的影响看起来最为直接，应该更加容易处理。

²³ 本文综述的文献中收入的定义非常繁杂，常见的有迁移之前的收入水平、调查时的收入水平（迁移之后的收入水平）、收入的滞后项或者采用生产资料的价值替代收入等，其中迁移前后的收入水平需要特别注意区分，只有经过一些必要的调整，调查时的收入才能反映迁移发生之前劳动力及其家庭的收入水平。此外，还需要注意区分家庭（包含迁移者）和农户（不包含迁移者）的收入水平。部分文献考虑了各种形式的收入差距对迁移的影响或者相对收入对迁移的影响。本文正文部分不考虑用劳动资料价值替代收入的情况。

²⁴ Zhao(1999b)提供了迁移者所在家庭和非迁移者所在家庭的人均农业收入情况和比较。注意：根据通常的定义迁移者所在的家庭一定是迁移户，而非迁移者所在家庭不仅包括非迁移户，也包括了部分迁移户。

²⁵ 都阳的文章提供了迁移家庭/农户、非迁移家庭/农户的明细收入，包括农业收入、本地非农收入、迁移收入和迁移收入的转移等，信息非常丰富。

²⁶ 与Borjas(1987)不同的是，Borjas讨论了发生在确定的迁出地和迁入地之间人口迁移的选择性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定义了负选择。本文则仅仅讨论了迁出地的迁出劳动力的选择性。当然，根据Borjas的理论，我们可以

(1997)等²⁷的研究则表明,劳动力外出比例和调整后的人均收入略呈倒U形关系(四川省体现得比较明显,而安徽省则不明显),收入中等偏低的农户外出打工的比例更高。换言之,在这些研究中,农村劳动力的迁移行为可能体现出一种中间选择性(intermediate selectivity)²⁸。

下面具体举一个例子,说明本文作者是如何根据文献中根据迁移后收入得到的结论推断出迁移发生之前迁移户和非迁移户收入比较的结论的。

例 1: 以李实(1999)为例

李实(1999)表明,在全国(19省调查)平均水平上,迁移户迁移后的人均收入和劳均收入分别低于非迁移户 1.6%和 16%。如果我们假定迁移者的迁移决策是理性的,他们追求更高的收入水平,那么他们外出的收入通常应该高于其务农²⁹可能获得的收入(迁移的机会成本的一部分)。所以,迁移者外出对其家庭总收入的净贡献为正值。又由于家庭劳动力相对其土地过剩(MPL<APL),且家庭的土地面积不会发生变化,则随着农业劳动力的迁移,务农人数减少,其他仍在务农的家庭成员的人均农业收入会有所增加³⁰。因此,迁移对迁移户总收入进而人均或劳均收入的总效应是正的,即迁移提高了迁移户的人均和劳均收入。见下表³¹:

表 2-1 乡-城迁移对于家庭收入的影响

	迁移收入	务农收入	净收入 or 总收入
迁移者	+	-	+
其他家庭成员	0	+	+
家庭	+	-	+

同时,由于假定迁移不会导致家庭间土地的重新配置,且不考虑其他复杂因素,则迁移并不会影响其他家庭的收入,当然不影响非迁移户的收入水平。

综上所述,在上文提到的一些常见假定之下,迁移确实提高了迁移户的人均收入水平,但是不影响非迁移户的人均收入水平。那么,如果在迁移发生之后,迁移户的收入水平仍然低于非迁移户,那么很自然可以推断出在迁移前迁移户的收入水平更是低于非迁移户,或者如前文所说,迁移存在着某种定义下的收入负选择。

[例 1 完]

设想:在同一个迁出地完全有可能出现向不同迁入地的人口和劳动力流动,根据迁出地和迁入地的不同特性以及迁移者的不同技能水平等等,完全有可能出现一地的迁出劳动力中同时有正选择、负选择的情况,最终可能导致迁移选择性不明确的结果。

²⁷ 张晓辉(1995)、时金芝(2004)也提到了来自中等收入家庭的劳动者更倾向于迁移。但是两篇文章的论证都存在某些不足。张晓辉(1995)认为,“外出者较多的来自中等收入的农户”,并且给出了外出劳动力分布在不同家庭收入段的比例,例如,26.4%的外出劳动力来自于收入在8000~12000元的家庭。但是作者没有说明把家庭收入划分成那样5段的原因,也没能够给出全体样本中家庭收入的大致分布情况,因此无法确认作者所认定的中等收入农户外出者多到底是由于样本中中等收入农户比例较大,还是因为他们的外出概率较高引起的。时金芝(2004)认为外出劳动力更多地来自收入中等偏上的家庭,不过文章中作者也意识到,这可能是由于作者使用的是迁移后的数据造成的。

²⁸ 这是Borjas(1987)中没有提到过的一种选择可能性,暂且翻译成中间选择性。Chiquiar & Hans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elf-Selec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Wages*.

²⁹ 为了得到下面的结论,通常我们还需要假设非农劳动者并不会参与到迁移中去,且原来务农的家庭成员的迁移对农户的非农收入没有影响。至于这个假设是否合适,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实证问题。

³⁰ 参见胡景北(1994)。

³¹ 加号表示该项收入增加,减号表示该项收入减少,0表示收入不变。

此外，都阳等（2003）让我们看到了迁移收入对农户提高收入以及减少贫困的重要意义。根据该文献提供的明细收入数据和例 1 中所提到的调整方法可以推知：迁移前迁移农户的人均纯收入低于非迁移户，但由于迁移收入的转移，迁移后迁移农户的人均纯收入反而比非迁移户高出 50% 以上。

2.2.5.2 文献综述结果：计量经济学模型

计量经济学研究也为研究迁移的收入选择性问题的研究提供了许多资料³²。蔡昉、都阳（2002）通过对中国西部贫困地区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发现：迁移之前的家庭收入³³与迁移概率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家庭收入在 2200 元时劳动力迁移概率最大。蔡昉对这种倒U形关系的解释是，家庭收入对贫困地区的人口迁移有积极作用，某一水平以上的收入使得劳动力可以支付迁移费用，抵御迁移带来的风险；但当家庭收入增加到一定程度时，迁移反而减少，劳动力更多地从事本地非农劳动。都阳、朴之水（2003）基于同一个调查数据的非参数估计表明，当家庭的预测收入少于 665 元时，迁移概率基本没有变化；而当收入超过此临界值时，迁移概率开始显著提高，随后又趋于平稳。

上述基于中国西部贫困地区劳动力流动数据的计量经济学研究表明：要成为迁移者，劳动者所在家庭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比如说其收入超过某一临界值。这样劳动者才能克服迁移的障碍，顺利地转移出去³⁴。结合前面关于迁移的收入选择性的描述统计文献，我们应该可以得到关于乡-城迁移的收入选择性的一个大致的模式：迁移者主要来自当地人均收入较低的一些家庭（相对于非迁移户群体而言。这与乡-城迁移的主要目的是经济目的吻合），但通常他们并不是来自那些最贫困的家庭。这种模式或许和上面我们提到过的迁移的收入中间选择(intermediate selectivity)有关（如杜鹰，1997）。

2.2.6 迁移选择性模式：总结

通过上文的文献综述，我们大致可以得到如下的中国乡-城暂时迁移者特征的基本模式：迁移者通常比较年轻，以男性为主，多数迁移者已婚，他们的教育程度高于非迁移者，且他们一般来自迁出地当地收入相对较低，但却不是最贫困的家庭。这些特征与非迁移者或农村劳动力总体有所不同³⁵。

但是应该注意到，以上的迁移者特征模式并不一定能够正确地反映出农村劳动

³² 计量经济学文献还提供了收入差距对迁移影响的证据，如朱农（2002），王格玮（2004）等；以及相对贫困（相对收入）对迁移影响的证据，如蔡昉等（2002）、朱农（2005），ch.7。由于和本文的主题联系不很紧密，这里省略。

³³ 迁移往往能够有效地提高家庭的收入，因此家庭收入很大程度上内生于劳动者的迁移决策。为了避免或减少内生性问题，本文所综述的文献的作者们通常不采用迁移当年的收入或迁移后的收入作为迁移的解释变量，而是使用其他的收入变量作为解释变量：例如，蔡昉（2002）使用调查获得的迁移前的家庭收入；都阳等（2003）使用了根据家庭成员受教育水平、土地、劳动力等因素回归计算得到的预测家庭收入和上年农业收入；王志刚（2003）使用了上年收入作为解释变量。

³⁴ 并不是所有的计量经济学研究都表明家庭收入对迁移决策有影响，或者说存在迁移的收入选择性。例如，王志刚（2003）发现上年收入对农户的外出决策无显著影响。朱农（2005）ch.7 在控制了相对收入（或者相对贫困）和其他常规人口变量之后，发现劳动者的迁移概率与收入的绝对水平（根据家庭财产情况估计）无关。与朱农的研究不同，蔡昉等（2002）在控制了相对收入变量后，发现了正文中所述的迁移概率和绝对收入之间的倒U形关系。

³⁵ 通过综述可以发现通常非迁移者的平均年龄大于迁移者；性别比例更为均衡；已婚的比例更高，本文综述过的一些文献表明，非迁移者中已婚的比例往往超过 80%（如Hare, 1999; Zhao, 2001; 白南生等，2002，蔡昉等，2002）；平均教育水平低于迁移者；在许多地区非迁移户的人均收入高于（未迁移之前）的迁移户收入水平。

力的特征对其迁移决策的影响：实际上已婚通常对于迁移有负向影响或者无显著影响；教育水平对迁移的影响不一定是正向的，两者之间还可能存在着非线性的倒 U 形关系，而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初中学历者的迁移概率高于其他组分。

3. 对上述中国乡-城暂时迁移模式的检验

在上一章，我们根据本文综述的文献总结出了一个中国乡-城暂时迁移者特征的大致模式。但是应该注意到，上述模式是在我们暂时忽略了迁移发生的时间、迁出地（和迁入地）特征（以及迁移者定义的可比性）的情况下得到的。因此，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从定性和定量两个层次重点检验上文总结出的模式是否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稳定性和普适性。具体地说，这种模式是否随着迁移发生的时间变化而相应变化？这种模式是否随迁出地（和迁入地）的不同而不同？

3.1 迁移选择性是随时间变化的吗？

首先我们来考虑迁移选择性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为了分离出迁移选择性随时间的变化，我们需要尽可能地保持其他可能影响迁移选择性（结论）的因素不变。例如，尽量使得迁移者以及迁移户的定义可比，因为前面已经提到过，不同定义下的迁移选择性很可能不同；尽量保持迁出地的可比性，因为许多理论和实证研究已经指出，迁出地以及迁入地的特性及其组合会影响到迁移的选择性等等。由于本文综述的文献数量较多，时间跨度长，涉及的省份（迁出地）较多，研究者所使用的迁移者定义和研究方法差别很大，因此保持迁出地、定义和研究方法不变，甚至使之具有可比性都是很困难的。在下文中，我们将从本文综述过的文献中挑选出可比性较强的部分，并试图借助它们来解决迁移选择性随时间变化的问题。

3.1.1 检验一：De Brauw et al. (2002)

De Brauw et al.(2002)无疑是本文综述过的文献中最适合来检验迁移选择性随时间变化问题的一篇。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一方面，该研究所用的数据集时间跨度近二十年，这使得我们有可能发现迁移选择性的变化及其长期趋势；另一方面，由于出自同一项研究，因此迁移者（户）的定义、研究方法和迁出地（及其流向）都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

De Brauw(2002)对 1981-2000 年间农村劳动力就业情况的分析表明：劳动者的年龄每增加 1 岁，引起迁移概率的下降相当于原有水平的 7%；男性的迁移概率是女性的 3.8 倍；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1 年，其迁移概率的增加相当于原有水平的 16%³⁶。可以看出，他们的研究基本上（在定性的层面上）证实了上一章末我们总结出的迁移选择性模式（或者迁移者特征）：迁移者比较年轻，以男性为主，且他们的教育程度高于非迁移者³⁷。

下面我们的任务是分析迁移选择性是否随时间推移而变化；如果确实发生了变化，那么变化的程度有多大，是否发生了重大变化。非重大变化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劳动力及其家庭的特征变量对迁移决策的边际影响变化不大，至少边际影响的符号不会发生变化（即定性变化）。

³⁶ De Brauw(2002)的研究没有涉及婚姻状况和收入对迁移的影响。

³⁷ 也证实了前面总结过的教育对迁移影响的第一类可能性：劳动力的教育程度越高，则越倾向于迁移。

De Brauw(2002)中包含了年代虚拟变量(1990s: 如果年份在 1981 和 1990 之间, 则 1990s=1)该文献对虚拟变量和其他劳动力/家庭特征变量的交互项的回归表明:(1) 90 年代的迁移者更加年轻化。在上世纪 80 年代, 年龄增加 1 岁引起的迁移概率下降相当于原有水平的 6%; 到上世纪 90 年代, 年龄对迁移的负效应增加, 增加 1 岁引起的迁移概率下降变为原有水平的 7%; (2) 性别选择性的变化非常明显, 迁移者中男女数量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上世纪 80 年代, 男性的迁移概率是女性的 6 倍, 到上世纪 90 年代缩小到 3.5 倍; (3) 教育对迁移的正向影响有所增强。上世纪 80 年代每增加 1 年教育, 迁移概率的增加相当于原有水平的 10%, 到 90 年代上升到 20%。但培训的重要性则有所下降。除此之外, 家庭劳动力数量对迁移的重要性有所增强, 但家庭成员平均非农经验的重要性有所下降。

综上所述, 迁移选择性并没有发生上文定义过的重大变化, 即边际影响的符号发生变化; 但是在定量的层面上, 许多变量对于迁移决策的重要性(用边际影响大小衡量)的确发生了变化, 尤其是迁移的性别和教育选择性在 1981-2000 期间的变化很明显。

3.1.2 检验二: 都阳、朴之水(2003)

都阳、朴之水(2003)是另一篇比较适合用来检验迁移选择性是否随时间变化的文献。作者在论文中比较了中国西部四个贫困县 1997 和 2000 年具有不同人口特征、教育水平的各人群的迁移概率。美中不足的是, 两个调查年份相隔时间较短, 可能不能识别出迁移选择性的变化。

都阳、朴之水的研究发现, 对比 1997 年和 2000 年各相同人群的迁移频率。可以发现如下迁移者特征的共同点和变化:(1) 在年龄上, 16-25 和 26-35 年龄段的迁移频率始终最高。但是从 1997 年到 2000 年, 迁移年龄有向后推移的迹象。相比 1997 年, 26 岁以上各年龄组的迁移频率均显著上升;(2) 在性别上, 男性在迁移劳动力中始终占多数, 样本中男性的迁移频率通常是女性的两倍以上。但 1997-2000 年期间男女迁移频率仍有所扩大, 这一特点在许多年龄段和教育水平的劳动者中都有所体现;(3) 在受教育水平上, 通常初中学历的劳动力迁移频率最高。但 1997-2000 年期间高中及以上劳动力的迁移频率提高, 这一变化在男劳动力上表现的非常明显。

总结都阳、朴之水的研究可以发现, 1997-2000 年在中国西部四个贫困县, 迁移年龄向后推移(迁移的年龄选择性减弱); 性别比进一步扩大(迁移的性别选择性增强); 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劳动者更多地参与到迁移之中(迁移的教育选择性增强)。不过对比 De Brauw(2002) 的结果可以发现, 由于两项研究在研究的时间段、迁出地背景、定义和研究方法等多方面的差异, 它们关于迁移选择性如何随时间变动的的基本结论也不一致, 尽管如此, 这两项研究还是在教育对迁移的重要性有所提升这一点上取得了共识³⁸。

3.1.3 检验三: 朱农(2005)第三章、何英华(2004)

利用同一文献提供的两年或者两个年份以上的数据作比较, 从而说明迁移选择性是如何随时间变动的机会毕竟难得。因此下面我们将在尽可能地保证迁出地、定

³⁸ 作为参考, 陈玉宇和邢春冰(2004)得到了不同的结论, 他们发现尽管在上世纪 90 年代(1991-1997)教育程度对于农村劳动力获得工资收入有正向影响, 但是在此时间段内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并没有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使用中国健康营养调查数据(CHNS)的计量研究表明: 在 1991、1993 和 1997 年, 每增加 1 年教育, 农村男性劳动者获得工资收入的概率分别提高 2.2%、3.2%、1.5%。当然如前所述, 农村劳动者获得工资收入并不能等同于乡-城劳动力迁移, 研究的具体时段也有所不同。

义和研究方法的可比性的前提下，继续研究上述问题。

朱农（2005）的第三章提供了 1990 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反映 1985-1990 五年间的情况）乡-城暂时性迁移者特征的描述统计，何英华（2004）则给出了 2000 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反映 1995-2000 年五年间的情况）省内省际非户口移民特征的描述统计。之所以把这两篇文献的结果进行对比，主要是因为两篇文献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先后相继的两次全国人口普查。代表性好，且相隔时间比较长。但是，这两篇论文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是可比的仍存在疑问。因为两次人口普查所采用的迁移者定义差别很大：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定义迁移者为离开所在县（市）一年以上的劳动者；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中迁移者³⁹指离开原户口所在乡镇半年以上的劳动者⁴⁰；而且我们并不十分清楚，何英华的论文中的省内省际迁移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和朱农文章中的乡-城暂时性迁移者可以等同起来⁴¹。尽管如此，这样的比较得出的结论仍然可能是有意义的。

对比两项基于普查数据的研究可以发现，相比前次普查，第五次人口普查所反映的年份中非户口迁移者的特征，尤其是他们的年龄、性别特征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朱农（2005）表明，在 1985-1990 年期间，15-34 岁年龄段的迁移者占到迁移者总数的 72%；而何英华（2004）则表明，1995-2000 年期间，15-39 岁年龄段的迁移者占到迁移者总数的 58.5%。这可能说明，在两次普查之间迁移者的年龄范围逐渐扩大，迁移者已经不仅仅限于年轻人了；在性别方面，两次普查间迁移者的性别比例已经由 1.5:1 下降至 1.06:1⁴²；迁移者的教育水平也有所变化。虽然两次普查中具有初中文化的迁移者占迁移者总数的比例均接近 50%，相差不大，但第五次人口普查时高中学历者所占的比例和位次均有所上升。两次普查间迁移者中具有高中文化者的比例由 9.5% 上升到 13.9%，排序也上升到第三位。

3.1.4 小结

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在尽量保证迁出地和迁移者定义可比性的前提下，研究了中国乡-城迁移者特征是否随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的问题，并且得到如下结论：

首先，上述分析在定量层面上支持了上一章总结出的中国乡-城暂时迁移者特征模式的一些基本结论，即迁移者通常比较年轻，以男性为主，多数迁移者已婚，他们的教育程度高于非迁移者。通过分析，没有发现上述定性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改变；

其次，在定量的层面上年龄、性别、教育的选择性发生了变化。由于不同研究中调查时间（段）、迁出地的选择、迁移者定义和研究方法等的差异，研究者在迁移者的年龄和性别特征如何随时间推移而变化上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是在教育对迁移的重要性逐渐增强上研究者们达成了共识。

³⁹ 此处更准确地说是流动人口。

⁴⁰ 此处的定义参考：段成荣，我国流动人口统计口径的历史变动。

⁴¹ 用省际或省内省际非户口移民特征来近似乡-城流动劳动力的性质是因为：(1)省际/省内省际非户口移民中，从村迁出的占绝大部分(84.2%和 75.5%)；(2)大部分省际/省内省际非户口移民现居住地为市或镇(74.7%和 81.4%)。

⁴² 由于城-城人口迁移的男女比比乡-城人口迁移的男女比例均衡一些，因此有理由相信，1995-2000 年实际的乡-城非户口迁移者的男女比例要高于 1.06:1。

3.2 不同迁出地的迁移选择性是相同的吗？

3.2.1 检验一：De Brauw et al. (2002)

接下来我们讨论来自不同迁出地（流向不同迁入地）的迁移者的特征是否相同这个问题。De Brauw et al. (2002)再次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帮助。De Brauw(2002)使用固定效应的Logit模型⁴³分析了 1981-2000 年间迁出地为浙江省⁴⁴和其他五省的迁移选择性的特点。

De Brauw 等人的分析表明，在同一时期内浙江和其他五省的迁移选择性的一些方面有所不同，例如性别、年龄、教育、培训、家庭非农经验、家庭劳动力等。De Brauw 等人发现，在浙江省，虽然男性的迁移概率仍然两倍于女性，但性别的选择性却大大弱于其他省，在其他省份男女的迁移概率之比为 4.78:1；相比于迁出地为其他省的迁移，正规教育对迁出地为浙江省的迁移更为重要一些：在其他省份正规教育的年限每增加一年，迁移概率提高原有水平的 16%，在浙江省这一提高相当于其原有水平的 20%；而培训、家庭非农经验以及家庭的劳动力数目对迁出地为浙江省的迁移影响小于其他省。此外，年龄对迁移概率的负向影响对于迁出地为浙江省的迁移影响略小：在其他省劳动力的年龄每增加一岁，迁移概率的下降相当于原有水平的 7%，在浙江省，这一下降相当于原有水平的 6.1%。

3.2.2 检验二：Hare (1999)、李实 (2001)、赵耀辉 (1997)、何景熙 (1999) ——迁移的性别选择性

这里的四篇论文都反映了 1995 年前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情况，但其调查地点各不相同，依次为：河南夏邑、山西、四川⁴⁵和成都郊县，如果可以进一步忽略迁移者定义的不同，我们会发现几乎同时发生在上述四个迁出地的迁移群体性别构成差异很大。其中Hare(1999)表明河南夏邑迁移者的男女比例超过了 10:1，而何景熙 (1999) 中的男女比例仅为 1.25:1。

表 3-1 不同文献中迁移群体的性别构成

	Hare (1999)	李实 (2001)	赵耀辉 (1997)	何景熙 (1999)
调查时间	1995	1995	1995	1994-1996
调查地点	河南夏邑	山西	四川	成都平原
男女性别比例	10:1	6.8:1	2.6:1	1.25:1

3.2.3 检验三：李实 (1999) ——迁移的收入选择性

在上一章通过对李实 (1999) 的分析，我们发现在全国平均意义上迁移户的迁移前的收入水平低于非迁移户，或者说在全国平均意义上迁移存在着某种定义下的收入负选择。但是当我们仔细观察该文提供的 19 省迁移户和非迁移户人均、劳均收入数据时，可以发现全国平均意义上的迁移模式可能并不一定适用于每一个具体的迁出地（如省份）。以劳动收入为例，全国平均意义上的迁移模式是：迁移发生之前“迁移户”的劳均收入低于“非迁移户”。然而在调查的 19 个省份中，仅有 13 个省份（一定）符合上述全国迁移模式，其余 6 省难于判断是否一定符合。而在符

⁴³ 回归包括了代表迁出地浙江省的虚拟变量以及虚拟变量和其他劳动力及其家庭特征变量的交互项。

⁴⁴ 包括了在浙江省内的迁移和迁出地为浙江，迁入地为其他省份的省际迁移。

⁴⁵ 四川省仁寿县和渠县，均为农业大县。

合全国模式的 13 个省份中，既有经济发达地区，如北京、江苏、浙江、广东，也有中部省份，如湖南、湖北，还有西部欠发达省份，如贵州、云南。似乎很难找出这些省份有什么共性，并且这些共性与上述收入的选择性有什么联系。人均收入的情况更是如此，仅有 6 个省份符合全国的模式。

3.2.4 小结和猜想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来自不同迁出地（流向不同迁入地）的迁移者特征，例如性别、教育、迁移前家庭收入水平等可能非常不同。一般而言，这些分析倾向于支持（至少在定性层面上）上一章总结出来的迁移者特征的基本模式，但是在李实（1999）中我们发现不同地区的收入选择性差别可能很大，并且不一定支持全国平均意义上的迁移收入选择性的结论。

对比上面对于迁移选择性是否随时间变化的讨论，似乎可以做出如下猜测：迁移选择性在不同地区之间差异可能非常大，因此试图总结出一个适合于全国范围（或者更大范围内）的选择模式而不至于失去其中许多内容可能是困难的。相比之下，同一地区的迁移选择性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它随时间的变化有可能是比较缓慢的。

参考文献

- *白南生、何宇鹏，回乡，还是外出？——安徽四川二省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⁴⁶，*社会学研究*，2002 年第 3 期
- Borjas, George J. “Self-Selection and the Earnings of Immigrants,” *Amer. Econ. Rev.*, Sept. 1987, 77(4), pp. 531–53
- *蔡昉（1996），劳动力迁移和流动的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 年春季卷，转引自赵忠（2004）
- *蔡昉、都阳，迁移的双重动因及其政策含义——检验相对贫困假说，*中国人口科学* 2002 年第 4 期
- ^蔡昉、都阳、王美艳，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附录：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研究综述，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蔡昉、白南生主编，*转轨时期的劳动力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 *陈玉宇、邢春冰，农村工业化以及人力资本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中的角色，*经济研究*，2004 年第 8 期
- *陈宗胜等，影响农村三种非农就业途径的主要因素研究——对天津市农村社会的实证分析，*财经研究*，2006 年第 5 期
- *De Brauw et al.,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Rural Labor Markets during the Reform*,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30, Issue 2, 2002, pp. 329-353
- *丁赛，农村汉族和少数民族劳动力转移的比较，*民族研究*，2006 年第 5 期
- *都阳、朴之水，劳动力迁移收入转移与贫困变化，*中国农村观察*，2003 年第 5 期
- *都阳、朴之水，迁移与减贫——来自农户调查的经验证据，*中国人口科学*，2003 年第 4 期
- *杜鹰、白南生主编，*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

⁴⁶ 前面加星号的文献表示本文综述过的文献；前面加三角符号的文献表示本文写作过程中参考过的国外国内相关文献综述。部分文献引用可能不够准确，请读者见谅。

1997

- *杜鹰, 现阶段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与宏观背景分析, 中国农村经济, 1997 年第 6 期
- 段成荣, 我国流动人口统计口径的历史变动, 人口研究, 2006 年第 7 期
- *庞丽华, 多层次分析方法在人口迁移研究中的应用——省际劳动力迁移的多层次分析, 中国农村观察, 2001 年第 2 期
- Greene, W., “Econometric Analysis (5th. Edition)”, Prentice Hall, 2002
- ^Greenwood, M.J. (1975a), “Research on internal mig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 surve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3: 397-433
- ^Greenwood, M.J. (1997), “Internal migration in developed countries”, in: M. Rosenzweig and O. Stark, eds., *Handbook of population and family economics*, Vol. 1B (North-Holland, Amsterdam)
- *Hare, Push vs. Pull factors in migration outflow and return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9 Feb;35(3):45-72
- *何景熙, 西部农业发达地区劳动力不充分就业问题初探, 管理世界, 1999 年第 2 期
- *何英华, 1995-2000 年户口迁移和非户口迁移: 描述和分析, *CCER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C2004016
- 胡枫, 关于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的估计,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6 年第 4 期
- *胡枫, 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8. 01
- ^胡枫,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 一个文献综述, 浙江社会科学, 2007.01
- 胡景北, 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工资上升运动的解释, 经济研究, 1994.03
- *胡英, 从农村向城镇流动人口的特征分析, 人口研究, 2001 年第 6 期
- *李璠, 外出打工人员的年龄结构和文化构成: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之一, 1994 年第 8 期
- *李实,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增长和分配, 中国社会科学, 1999 年第 2 期
- *李实, 中国农村女劳动力流动行为的经验分析, 上海经济研究, 2001 年第 1 期
- ^Lucas, R.E.B. (1997), “Internal mig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M. Rosenzweig and O. Stark, eds., *Handbook of population and family economics*, Vol. 1B (North-Holland, Amsterdam)
- *时金芝, 河北省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基本特征, 人口研究, 2004 年第 2 期
- *谭深,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性别差异, 社会学研究, 1997 年第 1 期
- *唐家龙、马忠东, 中国人口迁移的选择性: 基于五普数据的分析, 人口研究, 2007 年第 5 期
- ^Todaro, M.P. (1980), “Internal mig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survey”, in: R.A. Easterlin, ed.,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chang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
- *外来女劳工课题组, 外出打工与农村及农民发展: 湖南省嘉禾县钟水村调查, 社会学研究, 1995 年第四期
- ^ Walker, J.R. (2008), “Internal Migration,” in: L. Blume and S. Durlauf, eds.,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2nd Edition (Palgrave Macmillan, London)

- *王格玮, 地区间收入差距对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 基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 经济学 (季刊), 2004 年 10 月
- *王志刚, 耕地、收入和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农业技术经济, 2003.05
- 伍德里奇, J.M., 计量经济学导论: 现代观点,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 ^ Williamson, J.G. (1988),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H. Chenery and T.N. Srinivasan, eds.,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1 (North-Holland, Amsterdam).
- *谢正勤,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性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源的关系研究: 基于江苏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业经济问题, 2006 年第 8 期
- *邢春冰, 中国农村非农就业机能的代际流动, 经济研究, 2006 年第 9 期
- *Yao, 2001b, Egalitarian Land Distribution and Labor Migration in Rural China, CCER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E200107
- *原劳动部农村劳动力就业和流动研究课题组, 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和流动研究报告, 中国劳动出版社, 1999
- *张晓辉, 1994: 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实证描述, 战略与管理, 1995 年第 6 期
- *张晓辉, 跨区域流动的农村劳动力的年龄差异, 中国人口科学, 1997
- *张晓辉, 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中性别因素的影响, 调研世界, 1997 年第 2 期
- ^张永丽、黄祖辉,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研究述评, 中国农村观察, 2008 年第 1 期
- *赵树凯, 劳动力流动: 出村和进村——15 省 28 村劳动力流动调查的初步分析, 中国农村观察, 1995 年第 4 期
- *赵耀辉,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及教育在其中的作用: 以四川省为基础的研究, 经济研究, 1997 年第 2 期
- *Zhao, Yaohui, Labor migration and earning difference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47:767-782, July 1999
- *Zhao, Yaohui, leaving the countryside-rural to 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9 May; 89(2): 281-6
- *Zhao, Yaohui, The Role of Migrant Networks in Labor Migration: The Case of China, CCER Working Paper, 2001
- *^赵忠, 中国的城乡移民: 我们知道什么, 我们还应该知道什么? 经济学 (季刊), 2003 年 4 月
- ^Zhao, Z. 2004, Migration, Labor Market Flexibility, and Wage Determination in China: A Review,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XLIII-2 (June 2005): 285-312
- *周皓, 流出人口与农村家庭户特征——基于流出地的分析, 市场与人口分析, 2007 年第 2 期
- *周其仁, 机会与能力: 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和流动, 管理世界, 1997 年第 5 期
- *朱农, 离土还是离乡? 中国农村劳动力地域流动和职业流动的关系分析, 世界经济文汇, 2004 年第 1 期
- *朱农, 论收入差距对中国乡城迁移决策的影响, 人口与经济, 2002 年第 5 期
- *朱农, 中国劳动力流动和“三农”问题,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

附录一：两个常见研究主题—谁是迁移者和迁移决定因素的联系和区别

1

在乡-城劳动力流动的文献中（如Greenwood, 1997；蔡昉，2003），经常会同时存在两个研究主题：（1）谁是迁移者（2）迁移的决定因素。对应于两个主题，相应的存在两种主要研究方法。对于第一个主题，通常使用的研究方法是描述性统计，重点比较迁移者和非迁移者这两个群体的年龄、性别、教育程度、收入等特征；对于第二个主题，研究者多采用限值因变量模型（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s model，正文中常见的有二值Logit, Probit）分析各影响因素⁴⁷，如劳动力年龄、性别、教育等对迁移概率的边际影响（marginal effects），考察在其他因素不变时，某个因素的变动究竟是促进还是阻碍了劳动力的迁移以及影响有多大。

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察觉到，上述的两个研究主题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关联，而且两个主题通常涉及到的特征/影响因素也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重合的。两个研究主题的区别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方法层面上（通常分别采用描述性统计和限值因变量模型）。这里不妨以性别这个常见的影响因素为例加以说明⁴⁸。

[附二例 1] 描述性统计和限值因变量模型（以性别为例）

- i. 描述性统计表明：迁移者以男性为主；非迁移者中男女数量相当（或男性略少）。
- ii. 根据限值因变量模型（如 Logit）的回归结果，男性对于迁移的边际影响为正，或者说男性的迁移概率较高。

2

附二例 1 让我们感知到两个研究主题，同时也是两种研究方法之间关联的存在。为了印证这种感觉，进一步揭示二者之间，尤其是两种研究方法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下面用概率论的知识分析之。

仍以举例的方式说明。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从最容易分析的问题入手。我们假定某迁移的影响因素为 0-1 变量（或称二值变量）。这个假设看似很强，但实际上在劳动力流动的问题上有着广泛的应用，因为许多常见的影响因素，如性别、婚姻（不考虑离婚等）都是典型的 0-1 变量，诸如年龄组（15-19，20-25，26 以上等）、受教育水平（小学、初中、高中等）、家庭人均收入（1000 元以下，1000-5000 元，5000 元以上）等也都可以看成是 0-1 变量，当然它们的处理复杂一些，因此将稍后处理。

[附二例 1 续] 描述性统计和限值因变量模型（概率表达）

⁴⁷ 也有研究者同时应用描述统计和限值因变量模型研究迁移的决定因素，例如：赵耀辉，1999，蔡昉等，2002，朱农，2005 等。但是在这些文献中，两类研究方法是相互独立，平行存在的。研究者仅仅比较它们的结果。至于两种研究方法之间是否真的存在某些关系，有着怎样的区别和联系，研究者通常不加以讨论。

⁴⁸ 本附录中的例子仅为说明问题，并不意味着事实上一定如此。

设 X_i 为 0-1 变量，代表性别， $X_i=1$ ，代表男性， Y 为迁移变量，当 $Y=1$ ，代表劳动力迁移； $Y=0$ ，代表不迁移。

由[附二例 1] ii.可知，男性对迁移的边际影响为正（这里不考虑限值因变量模型的具体形式），对于 0-1 变量 X_i 而言，可以表达为：

$$P(Y = 1|X_i = 1, \bar{X}_{j \neq i}) - P(Y = 1|X_i = 0, \bar{X}_{j \neq i}) \geq 0 \quad (1)$$

注意， $\bar{X}_{j \neq i}$ 表示除性别外的其他自变量保持不变，按照习惯做法，设其他自变量都取样本均值。以后在不会造成混淆的情况， $\bar{X}_{j \neq i}$ 都略去不写。由条件概率公式可知：

$$P(Y = 1|X_i = 1) = \frac{P(Y = 1, X_i = 1)}{P(X_i = 1)} = \frac{P(Y = 1)P(X_i = 1|Y = 1)}{P(X_i = 1)}$$

$$\text{同理， } P(Y = 1|X_i = 0) = \frac{P(Y = 1, X_i = 0)}{P(X_i = 0)} = \frac{P(Y = 1)P(X_i = 0|Y = 1)}{P(X_i = 0)}$$

$$\text{代入式 (1) 整理化简得： } P(Y = 1) \frac{P(X_i = 1|Y = 1) - P(X_i = 1)}{P(X_i = 1)[1 - P(X_i = 1)]} \geq 0$$

$$\text{可以得到： } P(X_i = 1|Y = 1) \geq P(X_i = 1) \quad (2)$$

即迁移者中的男性比例（或频率）高于样本总体中的对应比例。

$$\text{由全概率公式得： } P(X_i = 1) = P(Y = 0)P(X_i = 1|Y = 0) + P(Y = 1)P(X_i = 1|Y = 1)$$

$$\text{代入式 (2) 整理可得： } P(X_i = 1|Y = 1) \geq P(X_i = 1|Y = 0)$$

$$\text{由于 } X_i \text{ 是 0-1 变量， } E(X_i|Y = 1) = P(X_i = 1|Y = 1)$$

$$\text{所以， } E(X_i|Y = 1, \bar{X}_{j \neq i}) \geq E(X_i|Y = 0, \bar{X}_{j \neq i})^{49} \quad (3)$$

以上的推导都是可逆的，这意味着式 (1) 和 式 (3) 是等价的。

$$\text{下面回到[附二例 1]. i.， 可以把它重新表述为 } E(X_i|Y = 1) \geq E(X_i|Y = 0) \quad (4)$$

比较式 (3), (4) 可以发现，两者不仅在形式上相似，含义上也有相通之处：它们都可以看作是关于“迁移者”和“非迁移者”的某种特征（如附二例 1 中的性别）的统计描述。因此，在正文中将两类文献合并在一起综述是有一定理由的。但是同

⁴⁹ 式 (3) 理解起来有些困难，它表示如果除性别之外的其他自变量保持不变，那么事实上的迁移者中的男性比例高于事实上的非迁移者。

时应该注意到，公式 (3) 要求在比较事实上已经迁移的和未迁移的两个群体的某种特性时，其他因素保持不变（这也是计量经济学模型所共有的要求），而公式 (4) 没有这样的要求。这个差异可能是很重要的，它使得研究者在两种研究方法进而两类文献之间不能完全划上等号。

3

接下来讨论诸如年龄段、受教育水平分组、家庭人均收入分组、耕地面积分组等变量（组数均大于 2）的情况。我们需要用一组 0-1 变量代表它们中的任意一个，例如教育水平。

[附二例 2] 需要用两个以上的 0-1 变量表示的影响因素（以教育水平为例）

这里 X_i 表示教育水平， $\bar{X}_{j \neq i}$ 表示除教育水平外的其他影响因素，并且保持在均值上不变。

在此，教育水平共分为三组，小学及小学以下、初中、高中和高中以上，分别用一组 0-1 变量表示：

$$X_{i1}, X_{i2}, X_{i3}。$$

$$\text{假设已知 } P(Y=1|X_{i2}=1) \geq P(Y=1|X_{i3}=1) \geq P(Y=1|X_{i1}=1) \quad (5)$$

由全概率公式，

$$P(Y=1) = P(X_{i1}=1)P(Y=1|X_{i1}=1) + P(X_{i2}=1)P(Y=1|X_{i2}=1) + P(X_{i3}=1)P(Y=1|X_{i3}=1)$$

由式 (5) 可得

$$P(Y=1) \geq [P(X_{i1}=1) + P(X_{i2}=1) + P(X_{i3}=1)]P(Y=1|X_{i1}=1) = P(Y=1|X_{i1}=1)$$

通过和前面[附二例 1 续] 类似的步骤：全概率公式 → 条件概率公式 → 全概率公式，再由 X_{i1} 是 0-1 变量得到： $E(X_{i1}|Y=1, \bar{X}_{j \neq i}) \leq E(X_{i1}|Y=0, \bar{X}_{j \neq i})$ ，即教育水平之外的其他因素不变时，迁移者中的小学学历者的比例小于非迁移者中的同一比例。

$$\text{同理可得： } E(X_{i2}|Y=1, \bar{X}_{j \neq i}) \geq E(X_{i2}|Y=0, \bar{X}_{j \neq i})$$

但 $E(X_{i3}|Y=1, \bar{X}_{j \neq i})$ 和 $E(X_{i3}|Y=0, \bar{X}_{j \neq i})$ 的关系（推广后也就是按照各群体的迁移概率大小排序，处在中间水平的组分）不能够被表达式 (5) 确定下来。

4

下一步，研究在变量为离散的非负变量，或者更通常地理解为非负连续型变量，如年龄、受教育年限、人均收入、耕地面积时，描述性统计和限值因变量模型的边际影响描述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附二例 3] x 是连续变量的情况（以受教育年限为例）

和上面的假定相似，Y仍然是表示迁移的二值变量，潜变量 $Y^* = x\beta + Z\Delta$ ⁵⁰和Y的关系是： $Y = 1 \Leftrightarrow Y^* > 0; Y = 0 \Leftrightarrow Y^* < 0$ 。其中x表示连续变量，表示受教育年限；Z表示其它的一组变量， β, Δ 分别是x和Z的系数（向量）。

对于 Logit, Probit 等常见的限值因变量计量模型而言， $\frac{\partial P(Y=1|x,Z)}{\partial x} = g(x\beta + Z\Delta)\beta$
g(.)表示 Logistic 函数和正态函数的概率密度函数。因此，x 对迁移概率的边际影响的符号仅仅取决于系数 β 的符号。

$$\text{又： } E(x | Y = 1) = E(x | x\beta + Z\Delta > 0) = E(x | x\beta > -Z\Delta) \quad (6)$$

当 $\beta > 0$ ，即教育水平 x 对迁移的边际影响为正时；给定 β, Δ ，且 Z 取均值。令 $-\bar{Z}\frac{\Delta}{\beta} = a = \text{const}$ ，可得： $E(x | Y = 1, \bar{Z}) = E(x | x > a)$

$$\text{同理可得： } E(x | Y = 0, \bar{Z}) = E(x | x < a)$$

$$\text{所以： } E(x | Y = 1, \bar{Z}; \bar{\beta}, \bar{\Delta}) > E(x | Y = 0, \bar{Z}; \bar{\beta}, \bar{\Delta})^{51} \quad (7)$$

$$\text{当 } \beta < 0, \text{ 同理可得： } E(x | Y = 1, \bar{Z}; \bar{\beta}, \bar{\Delta}) < E(x | Y = 0, \bar{Z}; \bar{\beta}, \bar{\Delta}) \quad (8)$$

对比描述性统计的结果： $E(x | Y = 1) \geq E(x | Y = 0)$ 或 $E(x | Y = 1) < E(x | Y = 0)$ ，我们不难发现，虽然本例中的 x 变成了连续变量，但基本上不会改变第 2 节末尾处的结论，区别在于此时需要事先通过计量经济学模型求出 β ，或者至少知道它的符号。

以上的讨论使我们明确了两类文献的关系。根据上面的分析可知，两类文献并不是毫无关联的两个独立的研究主题，两者之间存在着关联。当然，两类文献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在作者看来，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它们所通常采用的研究方法的不同：前者通常采用描述性统计；后者则着重使用限值因变量等计量经济学工具。本附录通过运用概率论知识进行推导可以发现，一方面两者都可以写成迁移者和非迁移者的某种特性的数学期望形式，因此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这也是本文正文部分把两类文献合并在一起综述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与其他任何计量经济学模型一样，限值因变量模型，包括通过推导后得到的数学期望形式，都强

⁵⁰ 为了记号的简洁，这里改用x表示讨论的自变量，其他自变量改用向量Z表示。

⁵¹ 常数a的取值是否为非负不影响上述结果。

调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条件。而描述性统计则不考虑这一点：人们观察到的迁移者和非迁移者当然可以具有不同的年龄结构、教育水平和收入。

附录二：表格ⁱ

表一

作者	文章标题			调查年份		调查说明		调查标题		描述方式		
	名称	发表刊物	发表年份	调查年份	调查说明	外出劳动力定义	劳动力流动程度	个人	家庭	社区和其他		
景帆	劳动力迁移和流动的经济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1994卷季卷, 第1期; 赵智, 2004 各个版本	1996	1985-1990	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	赵智的引文中无定义	赵智的引文中没有提及	描述统计、OLS (研究农村中移民和正移民之比的决定因素)			本图与全国农村收入之比; 本图与全国农村人口比例之比; 本图与全国人均耕地之比; 本图受限于乡镇企业的农民比例与全国这一比例之比	
朱志	劳动力流动的实证分析	中国劳动力流动与“三农”问题, ch.3	2006	1985-1990	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1%抽样数据。普查记录了1985-1990五年内的迁移	1985-1990年户籍(市)的常住地变动	全国迁移人口占总人口的约3%	描述统计 (有时按或正户口迁移), 与下页不分男女时对比迁移和正迁移者的特征, 得出的结论无重大区别, 故从略	年龄、性别、教育和技能、迁移原因			
朱志	收入差距对中国城乡迁移政策的影响, 结合朱志《中国劳动力流动与“三农”问题》, ch.6.1的描述统计	人口与迁移	2002	1991	1991年湖北省一次关于人口迁移和农村发展的问卷调查。涉及湖北省(县市21个社区)城市、镇、村委会)。样本数: 1353人	定义: 湖北农村, 调查时常住地为城镇, 且在此居住时间不超过15年的15岁以上常住人口	乡镇迁移者占284%	描述统计参考朱志《中国劳动力流动与“三农”问题》, ch.7; Probit (分性别估计)	年龄(和平方项)、婚姻、教育	家庭规模、兄弟姐妹数、劳动力是否长子(女)、家庭耕种面积	收入差距(消除了性别偏好后样本中劳动力迁移和不迁移时的收入之差)	
朱志	农民工是返乡—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和职业流动的关系分析, 结合朱志《中国劳动力流动与“三农”问题》, ch.7	世界发展杂志	2004	1991	1992年湖北省一次关于人口迁移和农村发展的问卷调查。本文使用了其中农村家庭户调查数据部分。涉及8时、1027户。其中3103个15岁及以上的人口构成本文的分析对象	定义: 湖北农村, 调查时常住地为城镇, 且在此居住时间不超过15年的15岁以上常住人口	所有的15岁以上人口中, 迁移者占59%, 本图湖北职业者占17.5%	描述统计、多重定义Logit模型(迁移者、对比湖北职业者)	年龄、性别、婚姻、性别、教育和技术专长、迁移者是否户主	是否户主、家中(岁及以上不在业人数、家庭其他成员、人均耕地、上年人均收入	对在图5区域调查、所在乡镇非农比例	
空嘴、韩晓	外出打工人员的年龄结构和文化构成—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之一	中国农村经济	1994	1995	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和中国农村银行信息新合作, 利用农村的农户抽样调查系统, 于1993年12月到1994年1月对全国24省市、442县、12473户农户进行调查。调查方法: 在各省抽取不同发展程度的县, 并在各县选30户左右收入水平不同的农户	外出打工人员: 无明确定义	外出打工非农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10.7%。中西差别高, 分别为14.3% 13.4%。东部较低, 为7.2%	描述统计 (东西三大地区)	年龄、性别、教育		东、中、西三大地区	
赵树凯	劳动力流动: 农村和进城—15省28时劳动力流动调查的初步分析	中国农村观察	1996	1995	1994年5-8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15省28县28时进行的调查。与其他一些大范围的抽样调查不同, 本调查不是为了报告全国的总体情况, 而是为了了解不同典型地区城镇农村劳动力流动和相关问题	外出劳动力: 无明确定义; 外出半年以上的劳动力称为常年外出劳动力	1995年外出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14.5%左右。外出数量最高的1时)达到43%, 最低者尚无外出就业者。常年外出劳动力占外出劳动力的80%以上。1995年28时外出劳动力总量是1983年的两倍多	描述统计	性别		城镇迁移	

张展翔、赵长保、陈良彪	1994: 农村劳动力跨区流动的证据描述, 结合“跨区流动的农村劳动力年龄差异”	张略与邵明; 中国人力资源	1996; 1997	1994	本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在1994年12月至1995年4月间进行的“农村劳动力跨区流动情况调查”数据。这次调查按照30%的比例, 对本村固定观察点的样本农户进行再抽样并入户访谈、填写问卷, 获得样本户7477户, 调查劳动力总数20727人	跨区流动的农村劳动力: 到本乡以外从事农业生产或务工活动的劳动力	1994年劳动力跨区流动者为14.4%。涉及样本中29.2%的农户, 占劳动力跨区流动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32.4%	描述统计 (和调查的劳动力总体比较)	年龄、性别、教育、技术和培训	家庭收入水平、家庭外出规模	移民网络
张展翔等	农村劳动力跨区流动中性别因素的影响	调查世界	1997	1994	本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在1994年12月至1995年4月间进行的“农村劳动力跨区流动情况调查数据”。这次调查按照30%的比例, 对本村固定观察点的样本农户进行再抽样并入户访谈、填写问卷, 获得样本户7477户, 调查劳动力总数20727人。在统计分析时剔除了一户中间时有男女劳动力外出情况, 因此本文所引用的样本小于总样本	跨区流动的农村劳动力: 到本乡以外从事农业生产或务工活动的劳动力	1994年劳动力跨区流动者为14.4%。涉及样本中29.2%的农户, 占劳动力跨区流动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32.4%	描述统计 (性别因素的影响)	年龄、教育和技能、流动的稳定度		移民网络
唐国生	多层次分析技术在人口迁移研究中的应用—以皖东农村迁移的多层次分析	中国农村观察	2001	1994	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1994年进行的“农村劳动力跨区流动情况调查”的农户问卷和村干访谈。共选取了8个县的调查数据, 涉及95村、141户。家庭层次变量来自农户问卷, 社区层次变量来自村干访谈, 省级变量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5	省内劳动力迁移: 家庭中劳动力向省外迁移		多层次Logit模型 (模型表一中的模型3, 不严格按照原文)	家庭劳动力数、家庭类型 (核心、直系或扩展家庭)、家庭收入分层、教育、家庭经营主业、人均播种面积、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年限	社区层次因素: 社区交通条件、迁移成本、多业兼业; 省级因素: 第一产业比重、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年限	
外来女农民工问题	外来打工与农村及农民发展—以皖东某县为例的村干访谈	社会学研究	1996	1994	1995年春节期间, 在湖南郴州地区嘉禾县对50户农户所作入户访谈。同时访谈了郴州地区、嘉禾县、村干相关部门以及村干所在村和所在村。调查前所作147户信息的电话表	无明确定义	有关外出经历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1%; 70%的农户有劳动力外出打工。那些没有外出的是老人户, 有的是因为子女正在上学	描述统计 (有关外出经历的劳动力)、个案分析	(第一次外出打工的) 年龄、性别、婚姻、子女、教育	婚姻、子女	移民网络
周其仁	机会与阻力—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流动, 结合劳动力转移和流动问题的研究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流动研究项目) 相关内容	调查世界	1997	1994	劳动部课题组在1995-1994年12月组织了4个大型的社会经济调查, 其中包括1995年年初对8省24县80村4000户农户所作抽样调查, 抽样采取分层随机等距抽样方法	外出流动的劳动力: 到本乡之外从事的劳动力	1994年19.4%的劳动力到本乡之外从事农业, 其中到省外农业的占2.5%。各省情况差异很大, 广东省农村劳动力外出的比例最高, 但出省的比例很低, 四川、湖北等省的流出比例较高	描述统计	年龄、性别、婚姻、教育水平、技能状况、个人迁移前的经济经历		
Han	Push and Pull Factors in Migration Outflow and Returns: Determinants of Migration Status and Spell Duration among China's Rural Population. 参考卷 (2004)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9	1996	作者和课题组1995年在河南省息县3个随机抽样调查点所得。涉及309户样本户。息县县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河南省处于中后水平, 人均收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调查期间外出打工 (migration activities) 的16-66岁劳动力	17%的劳动力为迁移者	描述统计、Probit (另有一节使用时间分析)	年龄、性别、婚姻、教育水平	人均生产面积、人均耕地	

空文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增长和分配	中国社会科学	1999	199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农村调查农户调查数据。涉及19省市、7973户	外出劳动力: 95年在农家庭或寻找工作1个月以上的劳动力(16-40); 外出户调查中至少有1个外出劳动力的农户	外出户占调查总户数的20.6%, 但各省市差别很大。	描述统计	教育水平(年限)	人均、人均收入	
社医	现阶段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基本特征和宏观背景分析	中国农村经济; 综合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分析	1997	1996	农业部农村研究中心和统计局合作在1994年春节期间所作抽样调查。利用四川、安徽两省农村调查户网络部分数据, 并追加外出劳动力指标。样本户: 2820个	农村外出劳动力是随机本是以打工者; 家庭成员中至少有一人外出打工的农户称为外出户	外出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9.0%, 外出户占样本总数的17.3%。根据农业部制定调查点系统1994年的统计, 全国外出打工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8.3%	描述统计	年龄、性别、婚姻、教育水平	外出户人均收入	移民网络(亲戚、血缘关系)
周海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性别差异在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及教育在其中的作用—以四川省为案例的研究, 综合Labor Migration and Earning Differences: The Case of Rural China	社会学研究	1997	1996	对原有部分数据的描述	定义不统一		描述统计	年龄、性别、教育		
赵成辉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性别差异在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及教育在其中的作用—以四川省为案例的研究, 综合Labor Migration and Earning Differences: The Case of Rural China	社会学研究	1997	1996	农业部农村研究中心和统计局合作在1994年春节期间所作抽样调查。利用四川省农村调查户网络部分数据, 并追加外出劳动力指标。样本户总数: 1820个	1996年在家乡以外的工作时间超过三个月的劳动力	迁移者占样本总数的8.5%; 从非农业/生产者占9.1%; 其余为农业者	描述统计, Logit(分析对象为劳动力)	年龄、性别、婚姻、教育水平	迁移户儿童数、人均耕地	村庄是否通公路
Zhao	Leaving the Countryside: Rural-to-Urban Migration Decision in China	AER	1999b	1994-1996	农业部农村研究中心和统计局合作在1994年春节期间对1994、1995四川农村外出移民所作抽样调查。利用四川省农村调查户网络部分数据, 并追加外出劳动力指标。涉及1820户、7410人	迁移户: 至少有一个家庭成员在家乡之外的地方工作一个月以上的农户。这个/些家庭成员称之为迁移者(定义与他1997不同)。迁移户与下期迁移者所在家庭(期刊迁移者家庭)定义不完全相同	根据定义, 1994年9.2%的劳动力或占20%的家庭迁移; 1995年8.7%或19.5%的家庭迁移	描述统计 1996年迁移者家庭、非迁移者家庭, 两者不匹配(分母), Logit(家庭为分析单位)	年龄、性别、婚姻、教育水平	家庭劳动力平均年龄、平均受教育年限、家庭规模和劳动力数、迁移前和在孩儿童数、人均耕地、人均农村收入(natural income, 无明确定义, 可能已经扣除了农业投资和转移收入), 1995年初家庭持有资产, 农业投资	村庄交通、通信情况、地理位置、是否少数民族地区
空文	中国农村女劳动力行为的经验分析	上海农村研究	2001	1996	农业部农村社会学研究所委托的调查数据, 调查地为山西省的10个样本村。调查是1997年春季进行, 调查内容是1995年农户的收入和劳务情况。样本户947户, 3423个样本个人	流动劳动力: 调查年份中有过外出打工经历的劳动者	男性劳动力外出打工比例为24%; 女性劳动力外出打工比例为4%	描述统计, Logit(农村女劳动力外出打工决策)	年龄、性别(本文的性别指男)、婚姻、教育水平	家庭劳动力人数、是否有其他家庭成员外出	村庄虚拟变量
陈玉华、廖春林	农村工业化以及人力资本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中的角色, 综合: 廖春林, 中国农村与农家庭业机会的代际流动	农村研究	2004	(1989)、1991、1993、1997、(2000)	中国健康营养调查(CHNS)数据。研究教育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时, 所用的样本总体是九省市农村地区16-65岁之间, 毕业院校同时在家庭中与户主属干父(母)子类别的男性劳动力。样本总数在400-800之间	除农村教育对劳动力转移影响时, 转移劳动力定义为有调查年份的前一年有月工资工作的劳动者。原文给出如下外出定义: 89、91、95年数据中, 在外居住1个月以上者; 97、2000年中报告为外出打工的劳动者	仅18%左右的劳动力外出, 原文认为大部分劳动力在农村内部不同部门(转移(其女性可能不转移)。历年有工资收入的比例保持在30%左右。原文定义给出了两次调查中儿子外出打工比例为: 13%、15%、22%、19%、29%。儿子的外出比例高于父亲且随岁上升	Ensh(91、93、97)、LEMI(结果基本一致, 未报告)、描述统计	教育、经验(及其平方, 定义为年龄-教育-1)、婚姻	家中挣钱的人数、土地、户主社会网络状况	

柯景照、罗雪	西部农业发达地区劳动力不 充分就业问题的初探—成都平 原12县(市)农村劳动力利 用调查数据分析	参阅世界	1999	1997	1997年3-9月在成都市12县 市(不包括市区)农村地区 所作的农村劳动力不充分就 业问题抽样调查。涉及平原 、丘陵和山区三种地形区的 6个村, 1290户, 4931人, 其中转移劳动力 3401人	外出打工的劳动 力: 1994-96年期 间凡外出打工时间 超过1年的, 且流 动期间不从平农业 且不在本地区从事 农业的劳动力	劳动力的流动率为 22.4%	描述统计	年龄、性别、婚姻、教 育水平	居住在类型(平原、 丘陵、山区)
Zhao	The Role of Migrant Network in Labor Migration: The Case of China	CCER Working Paper	2001	1998	1999年8、9月农业调查研 究中心对河北、陕西、安徽 、湖南、四川和浙江六省所 做农户抽样调查。共涉及农 户824户、劳动力2134人。 数据分为个人和家庭两个层 次	转移是在外工作 和生活。转移者因 1998年在农时超过 两个月和从事农 业活动的时期, 或在 外工作获得的收入 超过其他两类农人 的劳动力。新近转 移者(migrant migrant)是回迁转 移者(一年以上)和 回迁者之外的部分	根据定义, 转移者占 14.4%, 其中新近转移 者占总劳动力的7.6%	描述统计 1.E 转移者包括回 迁者; 转移者 包括新近和长 期转移者); Logit (1.家 庭中包括长期 转移者和回迁 者, 不考虑转 移网络, 11. 数据中不包括 上述两类人, 考虑移民网 络)	年龄、性别、婚姻、教 育水平	家庭劳动力人数、12岁 以下儿童和65岁以上老 人数
Yao	Egalitarian Land Distribution and Labor Migration in Rural China	CCER Working Paper	2001	1998	1999年8、9月农业调查研 究中心对河北、陕西、安徽 、湖南、四川和浙江六省所 做农户抽样调查。样本来自 34村的99个村民组, 样本户 共824户。调查的重点在于 中国土地制度对农业生产 和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绝大 部分数据反映了1998年的情 况, 回顾了之前土地分配的 情况	转移: 1998年劳动 者在外生活、工作 一天以上	约有50%的家庭参与 到转移之中。样本中所有 家庭的平均转移天数为 22天	Tobit模型, 家 庭为分析对象 。因变量为家 庭参与转移活 动的天数。重 点研究土地及 其分配权与 转移的关系	户主年龄、家庭最高 教育水平	家庭人口数、儿童-劳动 力比、家庭和财富、 土地面积、土地分配的 平均程度、土地再分配 的收入、家庭土地面积 的相对大小
胡英	从农村向城镇流动人口的特 征分析	人口研究	2001	1999	1999年人口流动抽样调查, 样本量121万人, 33.4万户	从农村向城镇流动 的人口: 居住在城 镇半年以上或居住 在城镇不满半年, 但其户口所在地 是半年以上的人口。 其户口是本省或外 省农业户口。这部 分人是乡镇非户籍 移民	占农村调查人口总数的 2.6%	描述统计	年龄、性别、婚姻、教 育水平	外出打工后的家庭人均 收入
白南生、 柯宇鹏	回乡, 还是外出?—安徽四 川两省农村外出劳动力回迁 研究	社会学研究	2002	1999	农业调查研究中心, 依靠国家 统计调查总队1999年安徽 、四川两省农户抽样调查数 据, 并对抽样农户进行补充 调查。涉及两省的12县, 3484户, 14541个劳动力。 调查的重点在于外出劳动力 的回迁问题	外出劳动力: 1999 年外出就业超过3 个月的劳动力。回 迁劳动力: 1999年 以前曾外出就业 , 但1999年没有 外出就业的劳动力	当年外出劳动力占农村 劳动力总数的13.7%。 外出户占农户总数的 28.8%。外出和曾外出 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 的二成。但劳动力外出 的接受在各个地方有很 大差异。外出劳动力比 例最高的近40%, 不足 5%的县也有9个	描述统计 1与 回迁劳动力、 全体农村劳动 力对比)	年龄、性别、婚姻、教 育水平	

景韵、郑阳	迁移的客观动机及其政策含义—以农村相对贫困程度	中国人口科学	2002	2000	2000年在西第四个贫困县所作农户问卷调查,涉及40村,382个农户。	迁移劳动力:2000年离家1个月以上、从事非农活动的劳动力	迁移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17.4%	描述统计(和样本中非迁移劳动力的均值比较)、Probit迁移方程(考虑相对贫困)	年龄、性别、婚姻、教育、技能、非农工作经验	家庭劳动力数、家庭耕地面积、迁移前家庭年人均年收入(平方米)、相对贫困(平方米)	帮助人数(移民网络)
De Brauw et al.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Rural Labor Market during the Reform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2	(1981-2000)	中科院农业经济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于2000年秋对河北、辽宁、陕西、浙江、湖北和四川六省60个村的农户调查,总共样本1199户,其中调查者有61个家庭的成员,1981-2000年的职业经历(尤其是非农劳动力),以上职业数据构成了本文分析的基础	迁移者(migrant wage earners):定义为参与非农劳动,但在劳动期间不住在家乡的人,以下简称迁移者。另有自愿雇佣迁移者(self-employed migrant)等	迁移者占被调查职业变化成员的比例为:4M(1985),5M(1990),10M(1995),17M(2000)。如果加上自愿雇佣迁移者,上述比例约为6.5M(1985),6.5M(1990),12M(1995),20M(2000)	描述统计(此表略)、固定效应 Logit: (1) Tab. 4 (1) 1981-2000; (2) Tab. 5 (1) 1980s vs. 1990s	年龄、性别、教育、技能培训	家庭劳动力数、家庭耕地面积(2000年)、家庭耐用品(2000年)、家庭成员平均非农工资	省份(浙江省和其他)、时间趋势、年份虚拟变量、1980s、1990s
郑阳、李之木	迁移与减贫—来自农户调查的经验数据:劳动力迁移收入与贫困变化	中国人口科学; 中国农村观察	2005	1997; 2000	西部山区四个贫困县农户调查,调查分两轮进行:第一轮在1997年底,290个农户;第二轮在2000年进行,除1997年涉及的农户之外,每村还增加了3户。第二轮调查382农户,涉及2348人	迁移劳动力:住在乡外,且连续从事非农活动超过10天的劳动力	农村劳动力迁移比例由1997年的20%提高到2000年的25%;涉及家庭的比例由1997年的40%上升到2000年的51%	描述统计(与迁移劳动力比较)、Probit迁移方程(个人、家庭变量)、非线性估计	年龄、性别、婚姻、教育	家庭规模、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成员的受教育年限、人均耕地面积、(农村)人均收入、年龄的儿童数、上季子女数、老人数	帮助人数目、帮助人除亲属外,上年农业收入(表示经济冲击)
柯英华	1996-2000年户口迁移和农村人口迁移:描述与分析	北京大学中国农村研究中心讨论稿系列	2004	1995-2000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之一抽样数据	关注非户口移民,包括跨省省内非户口移民。非户口移民高满足以下条件:农村在5岁以上,非户籍居住时间在1995.10.30后,居住在农村,户口在外地,用非户籍省内户口移民或户籍省内户口移民(非户籍省内户口移民)。	省内非户口移民占样本总数的15%以上人口)约2.4%	描述统计(附录表2):对跨省非户口移民和全国样本总体特征	年龄、性别、婚姻、教育、迁移原因(劳动力比例)		
				1995-2000	从村迁移到省外,以村迁移的占绝大多数(84.2%和75.5%)。 (2) 大部分省外非户口移民从居住地为非农业(74.7%和81.4%)	省内非户口移民占样本总数的3.2%	描述统计:对省内和省外非户口移民的特征,两者的特征基本一致,且一定程度上存在一些差异	描述统计:对省内和省外非户口移民的特征,两者的特征基本一致,且一定程度上存在一些差异	年龄、性别、婚姻、教育等特征上存在		
王莉华	山区低收入家庭对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基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探讨	经济科学(季刊)	2004	1995-2000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0.95%农户抽样数据。本文研究对年龄中年龄为15-44周岁的农村劳动力。本文所研究的农村劳动力均指农村非户口劳动力	迁移分析中界定1995-2000年人口迁移定义为最后一次迁移是由原居住地迁往其他县市的人	1995-2000年间农村男性劳动力移民约为1900万(根据文中的数据估计而得)	Netted Logit(分性别),这主要是关注个人特征	年龄、性别、婚姻、教育		山区低收入家庭、贫困、本省省虚拟变量

陈宗胜、周云波、任国强	影响农村三种非农就业途径的主要因素研究——对天津市农村社会的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	2006	约2000	天津市农村调查队调查,涉及12区县(大致划分为远郊区、近郊区和远郊县三类)的160户家庭	非农就业分为三类:家庭非农经营、外出企业务工和返乡乡镇企业就业。由于不能确定企业与居住是否相同和外出长短,很难把后两类和迁移对应起来。三类的具体定义不详	不详	Logit (非农就业参与), Logit (非农就业的且体途径)	教育	人均耕地、家庭农业、非农固定资产、家庭负担比例	区位(距中心城市远近程度)及当地乡镇企业的数量
周鸣	流出人口与农村家庭户特征	市场与人口分析	2007	1995-2000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0.95%样本抽样数据。本文针对原始数据中居住地为“县”的人口,主要针对家庭户,样本量207457户	家庭流出人口:本户户籍人口中外出(到本乡级以上)半年以上的人口	有流出人口的家庭约占样本总量的20%	描述统计; Logit (家庭户主特征)		家庭规模、是否有老人儿童、户主年龄、性别和受教育水平	
唐文波、马智东	中国人口迁移的选居论:基于五省数据的分析	人口研究	2007	1998-2000	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0.95%抽样数据。本文仅关注其中发生在1998-2000年期间的迁移行为	迁移:在调查时点上被调查者发生了跨越县级行政区域的迁移。临时迁移:如果被调查者只是临时改变了居住地,离开原居住地4个月以上但户口登记地没有发生变化	1998-2000年14岁以上人口中,农业户口人口迁移率为1.43%,农业户口人口临时迁移率为1.34%	描述统计(用临时迁移人口来近似乡镇非农劳动力。因为计算可知,临时迁移人口中非农人口占84%以上);非线性Logit模型(面板)	年龄、性别、婚姻、教育		
王志刚	外出、收入和农村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农业技术经济	2005	2001	2002年湖南郴州市永兴县,2镇、18村,每村抽取5个外出打工者(及其家庭)和5个未外出者(及其家庭)。共获得样本180个	外出打工者:2001年外出打工过的农民		描述统计; Probit回归(表2, 附)	年龄、性别、教育(小学、初中、高中及以上)	家庭负担系数(老人+儿童)/劳动力、人均耕地(平方米)	村外出人口比例、是否外出务工、交通情况
丁燕	农村技能和少数民族劳动力转移的比较	民族研究	2006	2002	中国社科院2002年农村调查大样本数据,涉及22省、907村。本文是在行晓村的层次上进行研究的	外出劳动力:在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外出4个月以上的劳动力。少数民族村:少数民族人口在30%以上的村	1998年调查的所有村庄中,外出4个月以上劳动力占本村人口的比例平均为41%,到2002年,比例上升为82%。少数民族村外出4个月以上劳动力占本村人口的比例1998年为34%,2002年升至52%,但依然低于平均水平 and 汉族村水平	描述统计、外出劳动力占本村劳动力百分比对本村人均收入、各民族村人均收入以及迁出其他特征OLS回归		技能和各少数民族村人均收入、人均耕地、生产条件、移民网络等	
叶文兰	河北省农村劳动力外出转移的基本特征	人口研究	2004	2002; 2003	(1)2003年春节前,河北省劳动力外出问题问卷调查。包括河北省五类地区(京津周围、山区坝上等)、73县、94个村民小组,共5054户。(2)2003年8-9月六县典型调查	外出劳动力:到本乡级以上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村劳动力	外出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19%,外出户比例为33%	描述统计	年龄、性别、婚姻、教育	人均受教育人	移民网络、地区

表二

作者	年龄	性别	婚期	教育、技能	描述统计					
					收入	人均耕地、资产	家庭规模和家庭成员	移民网络	迁出地特征	
景韵, 1996		男性农村迁徙者多于女性, 男性占55%								
朱志, 2006	15-24岁所占比例最高, 达到48%。其次是25-34岁, 占24.4%。分性别考察, 男性平均年龄略大于女性 (27.9 vs. 24.9), 且分布更集中一些	男女比例为1.49:1		且有初中文化的接近一半, 其次是有小学文化和文盲、半文盲, 高中文化的占9.5%。超过80%的男性移民在迁徙前就已经就业, 仅有3.1%为在校学生	迁徙原因以务工经商为主, 占41.7%, 其次是投亲靠友, 占13.7%					
朱志, 2002	与朱志 (2004) 相同									
朱志, 2004	迁徙者平均年龄为24岁, 小于非迁徙者的56岁	迁徙者中男性多于女性 (比例为1.05:1), 而非迁徙者中女性多于男性。但总的来讲, 迁徙者的性别选择倾向性的不明显		迁徙者的受教育年限长于非迁徙者 (7.6 vs. 6.1)。以学历分, 迁徙者中有64.1%具有初中学历, 高中以上占27.9%排第二位, 非迁徙者中初中比例高于迁徙者, 但仍排第一位, 高中学历者比例低于小学学历和文盲等三项四位。迁徙者中有技术专长的比例高于非迁徙者	迁徙者家庭上年人均收入略低于非迁徙者家庭 (1156 vs. 1220), 但迁徙家庭的总收入高于非迁徙家庭	迁徙户的人均耕地略高于非迁徙户 (0.09 vs. 0.11), 但家庭耕地面积高于非迁徙户	迁徙者家庭的劳动力比重高于非迁徙户。迁徙者家中15岁及以上家庭成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6.8年高于非迁徙者家庭的平均受教育年限6.5年 (但低于迁徙者的受教育年限)。迁徙者家庭中有技术专长的比例高于非迁徙者家庭。作为户主的家庭成员迁徙的精英较多		迁徙户家庭到县城的距离较小。	
定晴、舒 晓阳, 1994	无论性别、地区, 外出打工人员中处在18-30岁年龄段的比例最高, 其次是31-40年龄段。东中西三个经济带, 男性外出打工人员中至少有30%是在18-30岁, 女性外出打工人员中至少有70%是在这一年龄段	无论地区, 外出打工人员中男性数量均大大超过女性。三大地区中, 东部地区外出打工人员的男女比例比例最低, 但也达到了3.5:1。女性开始打工的年龄往往早于男性, 18岁以下女性打工人员占全体女性打工人员的比例要高于18岁以下男性占全体男性打工人员的比例。但40岁以上的女性打工者较少, 而40岁以上的男性打工者仍然较多		无论地区、性别, 在18-30岁年龄段中, 初中文化外出打工者的比例最高。除东部高中学历外出打工者较多外, 其余地区小学学历的外出打工者较多, 仅次于初中排第二位						

<p>老河坝， 1996</p> <p>张俊峰 等，1996</p>		<p>以男性为主，外出劳动力的男女比例比例为3.7:1</p>		<p>总的来说，腾龙镇的女性受教育水平高于男性，且具体表现在腾龙镇的女性劳动力中且有初中和高中文化的比例高于男性。但是男性且有某种技术专长和接受过职业培训的比例均高于女性</p>	<p>外出者比较多的来自中等收入（迁移发生之后）的农户，如超过25%的外出者来自年收入在3-8万的农户；23%的外出者来自年收入3-5万的农户</p> <p>原家庭外出网络把被调查农户分为5组，外出网络越大的组，其外出劳动力占总外出劳动力的比例就越小（不说明外出的几岁文字）。超过50%的外出劳动力来自家庭外出不足5年的家庭</p>		<p>50.5%的外出劳动力是由本镇农民帮助外出和介绍出去的。</p>	<p>对经济越发达，吸收就业的能力就越强，外出劳动力就越少。</p>
<p>张俊峰、 赵长保、 陈良彪， 1997</p>	<p>外出劳动力中以35岁以下青年为主，占74%，高于被调查总体中青年人的比例。18-35岁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率为15.8%，远高于其他年龄段</p>	<p>外出劳动力中男性劳动力远多于女性，性别比例约为3:1，而被调查总体中男女数量相当。在不同年龄段上，男女比例有很大差别，如17岁以上外出劳动力中，女性占到41.3%，年龄越大，外出劳动力中女性所占比例越小，这可能与婚姻有关</p>		<p>调查群体中初中文化的劳动力最多，占54%，比被调查总体的同一比例高17%。其次为小学文化，占32%。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腾龙镇流动的可塑性越大，农村的流动率仅为3%，小学、初中、高中文化水平的劳动力的流动率依次升高，分别为10.2%、17.7%和19.3%。调查群体中且有某种技术专长和受过职业培训的比例均高于被调查总体。中年人的技能情况好于青年和老年</p>			<p>54%的外出劳动力是由亲友带出去的，在移民获得的第一份工作中，超过60%的工作是由人介绍的。</p>	
<p>廖国华， 2002</p>								

<p>外来女务工问题, 1996</p>	<p>女性第一次外出打工的年龄比男性小。男性第一次外出打工的时间集中在21~25岁(0.26~0.30岁); 女性第一次外出打工的时间集中在17~20和21~25岁年龄段</p>	<p>韩永村外出打工者男女比例比例为1.8:1; 杭州地区平均为1.2:1; 杭州地区有明显的反叛, 外出劳动力中女性比例不断上升, 男女比例已经达到0.7:1, 这可能与广东一带用工单位一般以招收女工为本有关</p>	<p>全家外出约有三、五户; 夫妻一同外出的占外出户总数的近30%; 户主一人外出的占外出户的10%。可知已婚者外出居多, 外出女性中约2/3是随夫外出</p>	<p>男性外出者的文化程度集中在初中(158%), 女性外出者的文化程度则集中在小学(141%)</p>		<p>有正上小学的子女的家庭通常只有父亲一人外出, 而年轻夫妇和孩子已成年的夫妇几乎都一男外出。</p>	<p>80%以上的外出打工者是由亲戚、乡邻介绍的, 盛行亲戚的介绍, 并非集中在一个地方。亲戚是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农民外出打工队队的作用(买网)</p>
<p>网式仁, 1997</p>	<p>外出农村劳动力年龄构成较为年轻, 他们的平均年龄为28.4岁, 其中年龄在16~25岁的比例为52%</p>	<p>男性为主, 男女比例比例为2.7:1</p>	<p>已婚者比例为53%, 略高于未婚者</p>	<p>较高的人力资本与农民较早的投入劳动、较强的适应性和居住较高收入机会紧密相关。外出劳动力的文化程度明显高于全体农村劳动力。外出劳动力中超过70%且有初中及以上文化(主要是初中文化), 而全体农村劳动力中仅有43%且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外出劳动力中掌握专门技能的比例(43%)大大高于全体农村劳动力(12.8%)。掌握专门技能的劳动者, 已有71%都先转入收入较高的非农产业, 农民特殊的经历, 如城市的经历, 有助于流动就业</p>			
<p>Hall et al., 1999</p>	<p>迁移者的平均年龄为29.4岁, 低于其迁移者30岁</p>	<p>绝大多数(91%)的迁移者为男性, 而其迁移者中男性仅占41%</p>	<p>迁移者中62%已婚, 其迁移者中55%已婚</p>	<p>劳动力总体受教育程度较低, 但迁移者的受教育年限略长于其迁移者(6.8 vs. 5.8)</p>	<p>人均收入无明显差别(11.44 vs 11.41 mm); 迁移者家庭人均生产产值/少于其迁移者家庭</p>	<p>家庭规模、(分性别)劳动力数无明显差别, 迁移者家庭中老人和学龄儿童(6-15岁)略少</p>	
<p>空文, 1999</p>	<p>外出劳动力平均年龄在27岁左右, 明显低于其类劳动力。外出劳动力中80%为35岁以下青年</p>	<p>外出劳动力中男性明显多于女性, 性别比例为2:1, 但18岁以下年龄段中, 女性比例高于男性</p>	<p>外出劳动力中未婚者多于已婚者, 但两者数量上差别不大。分性别看, 男性外出劳动力中已婚者居多, 女性外出劳动力中未婚者居多</p>	<p>外出打工者的受教育年限比其外出户中的劳动力受教育年限长1.3年(8.3 vs. 7), 但是外出户中的其外出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只有4.2年</p>	<p>全国: 外出户人均、劳均收入分别低于其外出户人均、劳均收入1.5%、1.6%。可以合理推测迁移发生之前外出户的收入是低于其外出户。不过各省的情况有所不同, 在19个省份中, 外出户人均收入比其外出户低的有4个; 外出户的劳均收入比其外出户低的有13个, 可以合理推测迁移发生之前他们的收入低于其迁移户</p>		
<p>代医, 1997</p>	<p>外出劳动力平均年龄在27岁左右, 明显低于其类劳动力。外出劳动力中80%为35岁以下青年</p>	<p>外出劳动力中男性明显多于女性, 性别比例为2:1, 但18岁以下年龄段中, 女性比例高于男性</p>	<p>外出劳动力中未婚者多于已婚者, 但两者数量上差别不大。分性别看, 男性外出劳动力中已婚者居多, 女性外出劳动力中未婚者居多</p>	<p>外出打工者的受教育年限比其外出户中的劳动力受教育年限长1.3年(8.3 vs. 7), 但是外出户中的其外出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只有4.2年</p>	<p>全国: 外出户人均、劳均收入分别低于其外出户人均、劳均收入1.5%、1.6%。可以合理推测迁移发生之前外出户的收入是低于其外出户。不过各省的情况有所不同, 在19个省份中, 外出户人均收入比其外出户低的有4个; 外出户的劳均收入比其外出户低的有13个, 可以合理推测迁移发生之前他们的收入低于其迁移户</p>		<p>外出劳动力中绝大部分是由亲戚或本村村民介绍的。</p>

<p>陈海, 1997</p>	<p>外出劳动力的主体是35岁以下的青壮年农民, 比例占到70%~80%, 其中女性平均年龄小于男性 (没有给出数据来源)</p>	<p>在15岁以上的进城务工人员较高的农村迁移者中, 男女比例比例为2.3:1 (四舍五入); 根据一系列调查, 1995年后, 外出务工人员较高的农村劳动力的比例比大致为2.1。例如, 劳动部1995年进行农村调查, 外出比例比例为2.71。同时男女比例比有下降的趋势, 根据农业部农研中心对75种跟踪调查, 外出劳动力中女性的比例在上升, 相应的, 比例比已由1988年的3.75:1降至1994年的2.29:1</p>		<p>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不仅高于全国农村劳动力的平均水平, 而且 (可能) 高于农村移民农村劳动力的平均水平。对比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农村15~30岁人口和此移民农村1994年所作442名农村外出劳动力调查的教育水平, 可以发现后者中且有初中和高中文化劳动力的比例高于前者</p>					
<p>赵成辉, 1997</p>	<p>迁移者的平均年龄约为27岁, 比非迁移者年轻10岁</p>	<p>72%的迁移者为男性, 而非迁移者中男女相当</p>	<p>49%的迁移者已婚, 而非迁移者超过80%已婚</p>	<p>相对于非迁移者 (42岁), 迁移者的受教育年限较长 (7.4年), 且迁移者中且有初中文化的比例为52%, 高于非迁移者34%的水平。但迁移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短于从事农业/生产者</p>	<p>迁移者家庭的户规模 (0.85 mm) 远低于非农业者家庭 (1.0)</p>				
<p>Zhao, 1999b</p>	<p>虽然迁移者的定义有所差别, 但结论与赵, 1997类似</p>	<p>虽然迁移者的定义有所差别, 但结论与赵, 1997类似</p>	<p>虽然迁移者的定义有所差别, 但结论与赵, 1997类似</p>	<p>迁移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长于非迁移者 (7.4 vs. 6.3)</p>	<p>迁移者家庭的户规模 (net rural income, in 1995 Yuan, 无明确定义) 为1042元, 低于非迁移者家庭同一项收入15%。由于农业劳动力迁出, 人均农业收入会下降, 因此上文的结论并不说明在迁移发生之前迁移者家庭的户农业收入较高, 迁移者家庭的户规模高于非迁移者家庭</p>	<p>迁移者家庭的户规模 (0.85 mm) 远低于非农业者家庭 (1.0)</p>	<p>迁移者家庭的规模和劳动力人数 (比例) 均大于非迁移者家庭。迁移者家庭和迁移者家庭的户规模 (比例) 均大于非迁移者家庭。迁移者家庭的户规模 (比例) 均大于非迁移者家庭。迁移者家庭的户规模 (比例) 均大于非迁移者家庭。</p>	<p>非迁移者家庭所在村庄的交通和通信设施好于迁移者家庭所在村庄。非迁移者家庭所在村庄的户规模 (比例) 均大于非迁移者家庭。非迁移者家庭所在村庄的户规模 (比例) 均大于非迁移者家庭。</p>	<p>非迁移者家庭所在村庄的户规模 (比例) 均大于非迁移者家庭。非迁移者家庭所在村庄的户规模 (比例) 均大于非迁移者家庭。</p>
<p>空文, 2001</p>	<p>女性: 20岁以下女性劳动力外出比例最高, 外出的天数最多, 其次是20~24岁年龄段, 25岁以后无论是外出劳动力数量, 还是外出劳动天数都急剧下降。这很可能与女性的婚嫁行为有关。男性: 20岁以下外出劳动力数量和天数都最多, 此后急剧下降并有反复, 如30~34岁外出劳动力也较多</p>	<p>从外出劳动力的数量上看, 男女比例比例为4.8:1; 从就业时间 (人数*平均就业天数) 上看, 男女比例高达47.8:1</p>		<p>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 外出打工的比例提高, 这对男女劳动力都基本适用。但对于女性劳动力而言, 初中教育比高中或小学教育更有利的提高了女性外出的比例。 (在Lorenz图中没有发现这一规律)</p>					<p>部分村庄呈现变量非常显著, 但没有研究它们和诸如年龄、教育的交互关系</p>

陈玉宇、 廖春冰， 2004	特别是对于本土而言， 超过一定年龄之后，其 就业机会（获得工匠收 入）会随着年龄的增加 而降低。本土中全年 在家、有工匠收入和农 业就业的比例均低于其 子女			教育与工作机会之间存 在正相关关系，表现 为：有工匠的劳动者教 育水平高于没有工匠的 劳动者。儿子的教育水 平高于本土					
柯景顺、 罗西， 1999	年龄越大，失业的可疑 性越小。25岁以下劳动 力失业可疑性最高	男性失业的概率高于女 性(20% vs. 14%)。这一 差异比许多文献中表现 出的小	未婚者失业的概率最高 (34%)，高于有配偶 者(20.5%)、离异和 丧偶者(13.5%)	高中文化的劳动力失业 概率最高，初中小学 依次递减，文盲和半文 盲失业概率最低。大 学以上的劳动力失业的 概率显著低于小学文化 程度的劳动力					居住在平原地区的劳动力 失业概率最高，丘陵地区 最低。作者推测这可能 与平原地区不充分就业 为严重，而丘陵地区不 充分就业比例较轻有一 定关系。但是同一地区 中不同村落的失业概率 差异仍有待说明
Zhao, 2001	迁徙者（包括长期和 新近迁徙者）的平均 年龄为27.7岁，而土 迁徙者的平均年龄为 41.5岁	迁徙者中男性占到 61.4%；而土迁徙者 中男性仅稍高于女性 (50.4%)	迁徙者中已婚者接近 一半，而土迁徙者的 已婚比例高达89%	迁徙者中且有初中学 历的比例最高，占49.4%。 其次是小学；土迁徙 者中且有初中学历的 比例最高，占43.2%。 其次是初中，占34.4%	迁徙者家庭的劳动力 比例少于土迁徙者家 庭(1.44 vs. 1.73 mn)	迁徙者家庭的劳动力 人数少于土迁徙家 庭。儿童和老人数量 两者相当	迁徙者所在村庄有较 多的长期在外者和回 迁者	迁徙者所在村庄从事 农业的劳动力比例较低 ；村人均收入略高于 土迁徙者所在村庄	
	新近迁徙者更为年轻	新近迁徙者中男性仍 高于女性，但男女比 例更趋平衡一些	新近迁徙者的已婚比 例更低(40.8%)	新近迁徙者中初中比 例更高	新近迁徙者家庭的劳 动力比例少于土迁 徙者家庭(1.33 vs. 1.73 mn)	迁徙者家庭的劳动力 少于土迁徙家庭(1.5 vs. 3)；老人和儿童 数量基本相当		新近迁徙者来自农业 不发达，人均收入更 低的村庄	
Zuo, 2001									

<p>胡英, 2001</p> <p>白南生、初宇鹏, 2002</p>	<p>流动人口年龄结构比城镇和农村常住人口年轻。15-49岁青壮年流动人口占流动人口比例为70%。25-29岁是进入城镇的峰值年龄组。流动人口年龄的平均数为34岁，低于城镇和农村常住人口。流动人口中14岁以下儿童比例接近20%。</p> <p>外出劳动力比从未外出者年轻10岁以上，而回流者年龄和从未外出者接近</p>	<p>外出或曾外出劳动力性别比为2:1，而全部农村劳动力男女数量相当</p>	<p>流动人口中15岁以上已婚人口占大多数。流动人口中15岁以上未婚人口占20%，高于农村常住人口的比例。这主要是因为流动人口相对年轻。</p> <p>仍在外出的劳动力中已婚和未婚的人数基本相当，而已回流的劳动力中已婚和未婚的比例与从未外出的劳动力接近，已婚的比例超过80%。考虑到性别与婚姻期的交互作用，在有过外出经验的劳动力中，2/3的已婚男性仍在外出，而一半以上的已婚女性已经回流。未婚者中，无论男女，回流者均不足一成。</p>	<p>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高于流出地（但低于流入地）。流动人口中初中文化和高中文化的比例都高于农村常住人口。流动人口中男女受教育程度差距大，男性中且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远远高于女性（71.4% vs. 9.8%）。</p> <p>仍在外出的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长于从未外出的劳动力和已回流的劳动力，但略短于流出地劳动力。仍在外出的劳动力中初中文化水平约占45%，超过从未外出的和已回流劳动力的相应比例。</p>	<p>比随迁者迁移后的家庭收入和本地迁移者的家庭收入：外出户的平均收入水平高出本地户17%。外出户家庭收入高于10000元的比例高于本地户；本地户家庭收入低于1000元的比例低于本地户。</p>			
<p>景新、张阳, 2002</p>	<p>迁移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为28.4岁，低于本地迁移劳动力11岁</p>	<p>迁移劳动力的男女比例比接近3:1，而本地迁移劳动力中男女数量相当</p>	<p>迁移劳动力中超过80%未婚，而本地迁移劳动力中80%已婚</p>	<p>迁移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为7.8年，比本地迁移劳动力的平均水平高3.2年；迁移劳动力和本地迁移劳动力的技能水平相当不高，但前者高于后者；迁移劳动力的非农工作经验比本地迁移劳动力丰富</p>	<p>迁移劳动力所在家庭的劳动力数量小于本地迁移劳动力所在家庭（11.4 vs. 2.2）</p>	<p>迁移劳动力所在家庭的劳动力数量多于本地迁移劳动力所在家庭（14.04 vs. 3.33）</p>	<p>迁移劳动力农户的家人略多于本地迁移劳动力所在家庭</p>	

et al., 2002									
张阳、李 之木, 2005	16~26岁和24~35岁年龄段的迁移频率最高。迁移年龄有后移的现象。从1997年到2000年, 16~23岁男女劳动力的迁移频率均略有下降, 其中该年龄段男性劳动力的迁移频率低于24~33岁而居第二位。24岁以上, 特别是34岁以上各年龄的劳动力迁移频率均有所提高	样本中男性的迁移频率是女性的两倍以上, 且从1997年到2000年男女迁移频率的差距有所扩大		通常初中学历的劳动者迁移频率最高, 从1997到2000年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劳动者(尤其是男劳动力)迁移频率提高。迁移户中学历最高的家庭成员受教育年限长于非迁移户	迁移农户(不包括迁移者)的人均农业收入与人均本地非农收入(假定迁移者在迁移之前从事农业)之和低于非迁移农户对应收入之和, 这可意味着在迁移发生之前, 迁移农户这一群体的平均收入低于非迁移户(11.5%以上, 因为迁移之后农户的人均农业收入可随之上升)	迁移农户的人均耕地面积小于非迁移户(11.4 vs. 1.75 mu)	迁移户的家庭规模和劳动力数(和比例)均大于非迁移户		
胡英华, 2004	省内非户口移民迁移的峰值出现在20~29岁(占51.7%), 而全国人口中同一年龄段仅占14.9%	省内非户口迁移移民中男性略多于女性, 性别比为1.12:1, 与全国人口性别比接近	已婚者多于未婚者, 但两者所占比例均较低(11.5%) 小于全国人口中已婚和未婚比例均值(159.7%)	省内非户口迁移者中且有初中文化者所占比例最高(54.1%), 且有初中及以上学历的比例均高于全国人口				省内非户口迁移移民的劳动力比例为69.4%, 是所有迁移类型中最高的(省内省内户口、省内省内非户口), 这可能与67.5%的省级农村户籍非户口移民的迁移目的为务工经商一致	
	非户口移民中20~29岁比例39%高于全国人口, 但低于省内非户口移民。但30~39岁及以上各年龄段所占比例均高于省内非户口移民		非户口移民中未婚者的比例略低一些(14.9%), 但仍明显高于全国人口中的比例	与省内非户口移民相比, 省内非户口移民且有初中学历的比例低一些, 但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比例要高一些					
王格林, 2004									

陈永胜、周云霞、任雨薇，2004									
周心，2007							有流出人口家庭的规模大于无流出人口家庭的规模，两者相差11人。有流出人口的家庭，平均每户有1.43人流出，且流出的男性略多于女性。二代户中有流出人口的家庭数量少于无流出人口的家庭数量；其他类型（如单身户、一对夫妇户、三代以上户）正负相抵。户主的性别、年龄特征与家庭结构和成员流出情况有关。		
唐文亮、马智东，2007	18-20岁迁出者达到峰值，此后迁出者快速下降，直到55岁左右迁出水平才趋于平缓。	计算可得临时迁出者的男女比例为1.47，高于迁出人口总体（1.11）和未迁出者的性别比（1.07）。	已婚人口迁出者较多，单身者迁出者较少，但未婚当年的人口迁出者高于单身者。从绝对数量上看，由于未婚者数量大，因此已婚者占全部临时迁出者的80%以上。	总体而言，初中文化人群的临时迁出率最高，高中及以上人群的迁出率与初中文化人群相差并不大。（相反，初中之后人口迁出率大幅上升）。对于男性人口，教育水平越高，迁出率越高。但初中之间，迁出率随教育水平提高而迅速上升，此后上升趋势平缓。对于女性人口，与男性趋势类似，但高中及以上的临时迁出率明显高于初中。					
王志刚，2005				初中学历者外出比例最高（44%），高中略低（34%），但仍明显高于小学学历者外出打工的比例（13%）。	2001年人均收入最高的20%（近似3等分）农民外出比例为42.5%，低于收入最低的20%的农民外出比例（40%）和其他组别（介于43%-53%之间）。				

<p>丁安, 2006</p> <p>时金芝, 2004</p> <p>程名望、史旭华、徐剑秋, 2006</p> <p>谢正翔、钟由宁, 2006</p>	<p>外出劳动力多为青壮年, 主要集中在18-35岁, 且各县区(除舍阿四联乡)先于该县农村劳动力比例相似, 均为45%</p> <p>各县区外出劳动力中男性比例都在70%以上, 且各年龄段中男性外出劳动力均多于女性, 这一现象在24岁以上各年龄段尤为明显</p> <p>男性外出劳动力中已婚者占70%; 女性外出劳动力中已婚和未婚数量相当</p> <p>初中文化占44%, 高于样本总体初中文化的比例(40%), 但整体文化水平低于河北省城镇劳动力适龄人口的教育水平, 且有技术专长或受过职业教育的比例低</p> <p>外出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长于未外出劳动力(7.8 v. 4.4年), 且前者受过培训的比例远高于后者(30.4% v. 5.1%)</p> <p>外出劳动力平均年龄为34岁, 比未外出劳动力平均年龄大8岁</p>	<p>男性比例超过40%, 跨省流动农村劳动力的男女比例比例(1.74:1)高于省内流动农村劳动力(1.58:1)</p>	<p>均在50%左右, 跨省流动的农村劳动力中已婚比例略高于省内流动的农村劳动力(51.2% v. 50.5%)</p>	<p>教育年限两者接近, 9-10年, 初中文化程度劳动力占全部转移农村劳动力的比例略高于50%, 其次是高中和小学</p>	<p>家庭人均非汇款收入: 跨省流动农村劳动力所在家庭人均非汇款收入为921元, 而省内流动农村劳动力家庭人均非汇款收入为824, 前者比后者高出11.5%。在一定条件下, 如劳动力多态的边际产量为零, 用家庭人均非汇款收入说明迁移发生之前家庭人均收入是合适的。人均非汇款收入和原有家庭人均收入不等)</p> <p>人均耕地数约11亩, 样本中流动农村劳动力的人均耕地数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中国统计年鉴2004》)</p>	<p>家庭人口数和家庭劳动力数几乎无差别, 流动劳动力家庭中方劳动力和人口之比为0.45, 远高于全国乡村劳动力占乡村人口的比例(《中国统计年鉴2004》)。跨省流动的农村劳动力家庭中外出打工人数略多于省内流动的农村劳动力家庭</p>	<p>该农村外出劳动力占本村人口的比例以及在农从业4个月以上的劳动力占本村人口的比例均高于少数民族农村平均水平, 但各少数民族农村的迁移倾向差别很大, 其中壮族和苗族的外出倾向高于该农村, 而回、羌、维吾尔和锡伯村的外出水平低于该农村</p> <p>东部沿海省份: 如广东、福建、浙江等以省内流动为主, 中西部省, 如湖北、湖南、四川等以跨省流动为主。</p>
<p>胡枫、王其文, 2008</p>	<p>省内和跨省流动的农村劳动力年龄的均值无明显差异, 都在29岁左右</p>						

作者	年龄	性别	婚姻	教育 家庭规模和家庭成员	收入	耕地、匠/客	移民网络	迁出地特征
景韵, 1996								本地态对人口比例对迁移有正影响;本地态对乡镇企业的农民比例对迁移有正影响
朱志, 2005								
朱志, 2002	无论男女,年龄与迁移倾向之间都存在倒U型关系。男性、女性的迁移倾向分别在48和42岁达到峰值		婚姻对流动有很强的正向作用	教育可以提高男性的迁移倾向,但对女性的迁移作用不明显	家庭规模扩大会提高女性的迁移倾向,但对男性迁移无明显作用	本地态对收入相对全国农村平均收入提高时,本地迁移率下降	人均耕地(常常作为过剩劳动力的代理变量)对迁移有正影响	
朱志, 2004	年龄对迁移有正向影响;而年龄与参与非农的倾向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峰值在38岁左右达到	男女在迁移倾向上差别不大;但男性参与非农的倾向高于女性。	婚姻会降低迁移倾向;但对于非农参与倾向无明显影响	教育对迁移有正向影响,受教育水平越高,迁移倾向越高;教育对非农的影响方向相同,但影响不如对迁移强。技术含量(调查中排在前列的职业为司机、厨师、教练、木工)对迁移和参与非农都有正向影响	劳动力是否充足对本对迁移无明显影响;但非农参与影响为负。家中6岁及以上不在业人员对迁移和非农参与均无明显影响		人均耕地(常常作为过剩劳动力的代理变量)对迁移有正影响	本地态对收入相对全国农村平均收入提高时,本地迁移率下降
空晴、韩 晓阳, 1994								村庄距离县城越近,迁移和非农参与的倾向越高。所在乡镇非农比例对迁移和非农参与有正向影响

<p>赵树强, 1996</p> <p>张俊峰 等, 1996</p>						
<p>张俊峰、 赵长保、 陈良虎, 1997</p>						
<p>施周华, 2001</p>			<p>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 对省际迁移有正向影 响。作者推测教育程 度越高者更可能参与 省内迁移, 而不是省 际迁移。对数据的交 叉分析表明, 仅有省 内迁移源动力的家庭 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略 高于省际源动力迁移 家庭 (4.1 vs. 3.7)</p> <p>扩展家庭中有劳动力 省际迁移的倾向低于 核心家庭和直系家庭 。家庭中劳动力数对 省际迁移有正向影响</p>	<p>从家庭在社区收入分 层中的位置来看, 高 收入 (考虑了汇款之 后) 家庭为出可迁移 较大。家庭经营农业 为农业的家庭比农业 为非农的家庭省际迁 移的可塑性大</p>	<p>人均播种面积对省 际迁移有正向影响</p>	<p>交通条件越好, 有 迁移倾向的社区省 际迁移的倾向高。 乡镇企业员工比重 对省际迁移有正向 影响。第一产业比 重越高的社区省际 迁移的倾向越低。 迁出省农村社保基 金人均占有量对省 际迁移有正向影响</p>

<p>外来女务工潮涌 现, 1996</p> <p>周武仁, 1997</p>							
<p>Hare, 1999</p>	<p>年轻人更倾向于 迁移, 24-35岁 (峰值) 和14-23 岁年龄段的迁移 频率最高</p>	<p>男性使迁移频率 提高30%。在所 有人口特征中, 特别是有一个 对迁移持续时间 有显著影响的变 量。男性迁移持 续时间短于女性</p> <p>婚姻是迁移频率减 少10%</p>	<p>正式教育对迁移频率 没有显著影响</p> <p>家庭男、女劳动力比 例对迁移无显著影响</p>		<p>人均生产地区/和 人均耕地对迁移频 率无显著影响。但 增加一亩耕地减少 迁移持续时间约 27%；人均生产地 区/对迁移时间有 正向影响</p>		
<p>空文, 1999</p> <p>社原, 1997</p>							

梁溪, 1991								
赵成峰, 1991	年长1岁, 迁移概率下降0.33%, 年龄对迁移决策的负向影响不大	女性外出概率低于男性近3%	婚姻降低外出概率2.2%	教育对迁出的影响很小。同文盲相比, 小学和初中文化水平的劳动者迁移概率提高2-3个百分点; 高中文化水平的劳动者的外出概率与文盲差不多, 但教育对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转移的影响显著		人均耕地面积对外出有负向影响		
Itano, 1999b	家庭劳动力平均年龄增加1岁, 迁移概率降低0.5%			每增加1个劳动力, 迁移概率提高8.4%, 相当于原有家庭迁移频率的43%。学龄前儿童数对迁移无显著影响; 在校儿童数对迁移有显著影响(在10%显著水平下)。作者认为由于他们的存在, 使得确保家庭土地使用的粮食产量可以被生产出来, 使得家庭中其他劳动力的迁移成为可能	农业投资增加会提高迁移概率, 但作用不明显	家庭耕地面积对迁移有负影响。耕地面积每增加1亩, 迁移概率下降2.8%	1995年年初持有的现金对迁移有负影响, 但作用不明显	村直通电话、是平原地区会降低迁移概率; 村直通山区会提高迁移概率。村直通少数民族地区会降低迁移概率
金文, 2001	Logit模型(方程1): 20岁以下的农村劳动力外出概率最高, 25岁以后外出概率大幅下降, 30岁以后外出概率很小的			和前述设计不同, 几乎没有发现教育水平对女性外出打工有任何显著的影响(受教育水平增加, 女性外出打工有负向影响)	家庭劳动力人数, 作为劳动力过剩情况的代理变量, 对女性外出打工有负向影响		有男孩家庭成员外出有助于女性劳动力的外出	

陈玉宇、 顾春林、 2004		已婚者倾向于没有 工匠收入，但这种 效应不明显	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 作用显著，1991、93 、97年，每增加1年 教育，在工业部门工 作的机会分别提高 2.2%、3.2%和1.5% 。除1991年，没有发 现经验对农村转移有 显著影响	家庭中挣钱的人数对 于转移的倾向或者无 显著影响(91)或者 有正向影响(93)。 如果户主在工业部门 工作，则其子在工业 部门中工作的倾向提 高20%以上；而户主 的教育水平及是否行 政干部对于转移无显 著影响		除1993年外，土地 面积对于转移的影 响均为负	
初景明、 罗密、 1999							
Zhao, 2001	(Table 4 Model I: 考虑长期迁移 倾向和网络，不 考虑移民网络) 年龄每增长10 岁，迁移倾向下降 5.1%	男性使迁移倾向 上升3.8%	对迁移有正向影响	结合Table Model III可知，教育对迁 移的影响是正性的。 Model III中教育对 迁移的正向影响主 要是来自初中教育	家庭每增加一个劳动 力，迁移倾向提高 0.7%；子女、老人 数对迁移无显著影响	家庭土地面积对迁 移无显著影响	对在中劳动力及农 户参与率提高 10%，迁移倾向降 低2.9%
Zhao, 2001	(Table 4 Model II: 不考虑上述 因素，考虑移民 网络) 年龄仍对 迁移有正向影 响，但其边际影 响绝对值减少 11.6%	男性对迁移仍有 正向影响，但其 边际影响减少	控制了移民网络因 素之后，(即使仍 采用全部的数据回 归) 网络变量的作 用不再显著	家庭劳动力数对迁移 无显著影响；控制了 移民网络变量后，年 龄的儿童个数对迁移 的作用变为显著，且 作用为负		长期迁移者数目对 迁移有正向影响。 回顾者书目对迁移 无显著影响	对在中劳动力及农 户参与率对迁移 没有显著影响
Zhao, 2001	户主年龄对迁移 天数无显著影响			户主受教育年限每 增加一年，家庭迁移 的天数增加4天，相 当于样本中平均迁移 天数的27%	家庭成员增加1人， 迁移天数增加20天； 儿童-劳动力比对迁 移天数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对于两个劳动 力和一个儿童的家 庭，再增加一个儿童 使得家庭迁移天数减 少33天	家庭初始财富对迁 移有正向影响，但 财富增加1000元， 迁移天数仅增加1 天；人均土地和迁 移期可能存在不可 形关系，但统计上 并不显著。对于土 地面积小于平均水 平的家庭，土地再 分配的可塑性降低 了其迁移天数；土 地面积大于平均水 平的家庭更倾向于 迁移。平均土地分 配导致更多的迁移	对人均收入对迁移 天数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收入增加 1000元，迁移时间 将减少13天。在当 地农业非获得收入 的机会减少了迁移 。没有发现对交通 信贷、信贷对迁移 有显著影响

胡英, 2001								
白南生、 何宇鹏, 2002								
景新、张 阳, 2002	年龄和迁移概率 之间存在倒U型 关系, 迁移概率 在29岁达到峰值	男性比女性的迁 移概率高出23%	婚姻对迁移有非常 强的正向影响, 已 婚者比未婚者的迁 移概率低1%	教育年限对迁移概率 的正向影响在统计上 是显著的, 但是增加 1年的教育使得迁移 概率仅上升0.34%。 性别对迁移的作用不 显著, 从事1年以上 农工作, 迁移概率上 升1%	增加1个家庭成员力 使得迁移概率提高 1.4%	家庭迁移前收入和迁 移概率存在倒U型关 系, 收入2250元时迁 移概率最大, 考虑到 +总则为贫困县, 因 此迁移概率应该随绝 对收入增加而增加。 设有说明相对贫困的 且估计公式, 但相 对贫困和迁移概率同 样存在倒U型关系。 当相对贫困程度达到 一定程度时, 农户将 失去迁移能力	家庭外出务工对迁 移有正向影响, 耕 地增加1亩, 迁移 概率下降3.1%	帮助人数对迁移 概率无显著影响
	年龄每增加一 岁, 迁移概率减 少量相当于原有 水平的1%	男性迁移概率是 女性的5.3倍		每增加一年教育, 迁 移概率增加量相当于 原有水平的36%。教 育的作用在控制了个 人能力后没有实质变 化。参加培训带来的 迁移概率增加相当于 原有水平的15%	每增加一个劳动力, 家庭成员的迁移概率 增加量为原有水平的 26%。个人迁移概率 随家庭平均非农劳动 强度增加而提升		家庭外出务工 (2000年水平)对 迁移有正向影响, 但作用很小, 增加 一亩耕地, 迁移 概率减少仅相当于原 来概率水平的1%	

<p>et al., 2002</p>	<p>90年代迁徙者更加年轻化。劳动力各地增加一岁引起的迁徙倾向减少量在80年代相当于原有水平的6%，到90年代则减少量为14%</p>	<p>性别选择的文化最为明显。80年代男性迁徙倾向是女性的6倍，90年代降至5.5倍</p>	<p>教育对迁徙的正向影响有所增强。80年代每增加一年教育，迁徙倾向增加相当于原有水平的10%，90年代这一数字上升为20%。但性别的重要影响有所减弱</p>	<p>劳动力数量对迁徙的重要影响有所增强；家庭成员平均非农业人口的重要影响有所减弱</p>	<p>2000年外出和耐用消费品价值对80、90年代迁徙的影响均很小或者在统计上不显著</p>	<p>20和90年代，迁徙倾向有很大变化，体现在个人的性别、教育、年龄以及家庭劳动力数量和家庭非农业人口上。浙江和其他省迁徙者最显著的区别在于性别比例，其他方面如年龄、教育等也有区别</p>	
<p>张阳、李之木, 2005</p>	<p>年龄对迁徙有正向影响</p>	<p>男性更倾向于迁徙</p>	<p>婚龄对迁徙有强烈的正向影响(婚姻系数)</p>	<p>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劳动力更倾向迁徙，但仅婚姻系数例外，相对于婚姻等，受教育年限的系数意义可更不十分明显</p>	<p>家庭劳动力数、老人数、子女数对家庭迁徙倾向和个人迁徙倾向有不同的影响。在个人迁徙倾向方程中，家庭劳动力数、老人数和子女数对劳动力迁徙倾向均无显著影响</p>	<p>上年农业收入对迁徙无显著影响。非参估计表明，控制其他变量之后，迁徙倾向在家庭预期收入小于445元之前基本没有变化；超过这一临界之后，迁徙倾向显著提高，而后迁徙倾向又趋于平缓</p>	<p>人均耕地面积对迁徙有正向影响</p>
<p>柯英华, 2004</p>							
<p>王格华, 2004</p>	<p>对于男性：年龄和迁徙倾向存在倒U型关系。在本文设定的15-44岁范围内，从15岁开始迁徙倾向不断上升，21岁时达到迁徙倾向的峰值，此后迁徙倾向下降。对于女性：迁徙倾向的峰值在24岁达到，峰值年龄大于男性</p>	<p>婚姻分为三类：未婚、五年内(1995-2000)结婚和五年内已婚。男性未婚者向城市迁徙的倾向高于已婚者，而五年内结婚者高于前已婚者。不同婚姻状况的女性劳动力向迁徙倾向差别大于男性。未婚者的迁徙倾向比前已婚者高得多，五年内结婚者向城市迁徙的倾向略高于前已婚者</p>	<p>无论男女，教育程度的提高增加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徙的倾向</p>				<p>地区间收入差距对迁徙有正向影响。对于不迁徙的选样，原居住收入越高，劳动力越倾向不迁徙；如果选择了迁徙，则其迁出前收入越高，劳动力越倾向迁出。因此，收入的影响为负。在工资相等的情况下，劳动力更倾向迁往省内或跨省迁徙</p>

陈宗胜、周云松、任国强, 2004			教育对农户非农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而远郊区这种影响更强。对于到外地企业就业, 增加一个具有小学、初中、高中文化的家庭劳动力分别提高其概率19%、16%、24%。对于本地企业而言, 只有初中文化是显著的, 增加一个初中文化的劳动力, 参与本地企业的概率增加1%。	回归系数对于家庭参与非农劳动无显著影响	人均耕地对到外地企业(以非农劳动的一种形式)有正向影响。农户占有的生产性固定资产对本地企业有一些影响, 但边际影响均很小。	距离城区越近的郊区农户参与本地企业的概率越高。乡镇企业数目对本地有正向影响。远郊区农民从事本地最重要的因素是教育和乡镇企业发展水平, 近郊区的显著因素是靠近中心地区的有利条件。越靠近城区, 农户越倾向于在当地企业就业而不是外出打工。	
周敏, 2004			家庭规模对家庭中有流动人口起正向作用。户内有老人和儿童对家庭中有成员流动起正向作用。户本年龄越大, 家庭中有流动人口概率越小。户本性别对成员外出无显著影响。当户本的教育水平为小学和初中, 则家庭中有流动人口的概率比女户略低约2%; 当户本文化为高中及以上, 成员外出的概率反而高于女户。				
唐文贵、马歇尔, 2004							
王志刚, 2005	年龄对外出打工有正向影响	对外出无显著影响	学历越高, 外出打工的比例越高	家庭人口数对外出打工有正向影响。家庭回归系数对外出打工有正向影响	上年有人对外出决策无显著影响。土地回归对外出打工无显著影响	人均耕地(及其平方根)对外出打工无显著影响	交通情况(到县城的距离等)对外出打工无显著影响。

丁森, 2006				1998年村人均受教育程度高, 2002年该村外出打工半年以上劳动力的比例越高; 1998年该村所在省人均受教育程度高, 2002年外出半年以上的劳动力比例越高		随着和亲戚邻居交流打工信息提高该村外出打工劳动力的比例; 而亲戚与亲戚邻居在农忙时相互帮工和忙闲时相互帮忙降低外出劳动力的比例	壮、苗族村外出劳动力的比例明显高于汉族村; 维吾尔、哈萨克民族村外出劳动力比例明显低于汉族村。位于平原地区的村, 外出6个月以上劳动力的比例显著低于山区; 1979年通电的村外出6个月以上的劳动力比例显著低于1998年后通电的村
叶金芝, 2004							
程名望、史岩华、徐剑快, 2006	18-27年龄段的外出打工比例最高, 此后逐渐下降	男性对迁移有正向影响	初中文化的外出打工比例最高, 其次是高中和小学文化的外出打工比例				迁出地人均耕地面积对迁移有正向影响, IRT对迁移有正向影响, 人口密度对迁移有正向影响, 迁出地GDP对迁移无明显影响。相比之下, 迁入地的特征对迁移可作用不明显
谢正朝、钟田宁, 2006	16~30岁外出比例最高, 这一年龄段劳动力的外出比例比45岁以后年龄段高出近37%	男性外出打工的比例比女性高出13.7%	初中和高中文化对外出有正向影响, 且初中文化程度劳动力的外出比例更强, 他们的外出比例比小学文化和未受教育者分别高24%、高中组比小学组高21%。说明对外出有正向影响	家庭外出劳动力比例对外出有正向影响	劳动群团对外出有正向影响	村外出劳动力比例(移民网络)对外出有正向影响	
胡斌、王其文, 2002			受教育年限与跨省流动频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跨省流动频率峰值出现在12.5年, 相当于本文定义的高中、中专(中专跨省流动频率最高)	家庭抚养人数越多, 劳动力更倾向于省内流动; 家庭打工人数越多, 劳动力更倾向于跨省流动			对于跨省流动而不是省内流动的影响最大的变量, 居住地为东部的农村劳动力跨省迁移的比例比中西部农村劳动力低30%左右

表三

I. 定义中外出时间的下限在一个月左右的

文献	调查年份	调查地点	定义：时间下限	定义：空间范围	劳动力迁移率（%）	家庭迁移率（%）
李实，1999	1995	19省市	一个月	在外就业		20.6
Zhao, 1999b	1994	四川	一个月	家乡以外	9.2	20
	1995	四川	一个月	家乡以外	8.7	19.5
都阳等，2003	1997	西部四贫困县	连续 10 天	乡外	20	40
	2000	西部四贫困县	连续 10 天	乡外	25	51

II. 定义中外出时间的下限在三个月左右的

文献	调查年份	调查地点	定义：时间下限	定义：空间范围	劳动力迁移率（%）	家庭迁移率（%）
赵耀辉，1997	1995	四川	三个月	家乡之外	8.5	
何景熙，1999	1994/96	成都郊县	四个月	外出打工	22.4	
白南生，2002	1999	安徽、四川	三个月	外出就业	15.7	28.8

III. 定义中外出时间下限在半年左右的

文献	调查年份	调查地点	定义：时间下限	定义：空间范围	劳动力迁移率（%）	家庭迁移率（%）
胡英，2001	1999	全国	半年	乡外	2.6	
Zhao, 2001	1998	六省	四个月至半年 ⁵²		14.4	
蔡昉等，2002	2000	西部四贫困县	半年		17.4	
周皓，2007	1995/2000	全国	半年	乡外		20
唐家龙，2007	1998/2000	全国	半年	县外，临时迁移	1.34	
丁赛，2006	1998	22 省大村寨	半年	外出	6.1	
	2000	22 省大村寨	半年	外出	8.2	

IV. 定义中没有明确指出时间下限的，暂且默认为一天。

文献	调查年份	调查地点	定义：时间下限	定义：空间范围	劳动力迁移率（%）	家庭迁移率（%）
----	------	------	---------	---------	-----------	----------

⁵² 迁移者指 1998 年在外时间超过务农和从事非农活动的时间，或在外工作获得的收入超过其他两类收入的劳动力。

朱农, 2004	1991/92	湖北			5.9	
李璠, 1994	1993	26 省市			10.7 ⁵³	
赵树凯, 1995	1994	15 省			14.5	
张晓辉, 1995	1994	固定观察点		跨区域	14.4	29.2
外来女劳工, 95	1994	湖南某村		有外出经历的	44	
周其仁, 1997	1994	八省		乡外	19.4	
Hare, 1999	1995	河南夏邑		外出打工	17	
杜鹰, 1997	1995	安徽、四川		县外	9	17.3
李实, 2001	1995	山西 10 村		外出 (男/女)	M: 24/W: 4	
Yao, 2001	1998	六省		在外		30
时金芝, 2004	2002/2003	河北		乡外	19	33
谢正勤, 2006	2004	苏北、苏中			54	100
DeBrauw, 2002	2000	六省		工作期间不在家	20 ⁵⁴	

i. 本文附录二中共有三个表格：表格一简要概述了综述文献的基本信息，例如：作者、发表情况、调查的时间、地点、迁移者（户）的定义、文章中使用的研究方法以及文章涉及到的迁移者特征等。表格二归纳总结了综述文献中提供的关于迁移者的各种特征和劳动者的特征对于迁移决策的影响方向和大小的信息，本文的正文部分正是基于表格二的信息，根据作者的理解写成的。表格三总结了在文献中出现过的迁移者的不同定义，同时给出了在这些定义之下迁移者（户）在迁出地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

⁵³ 指整半劳动力迁移率。

⁵⁴ 这里的迁移率指migrant wage earners和self-employed migrants占样本总体的比率。正文中在分析De Brauw, 2002时，迁移者专指前者。

Impressum

Jingji fazhan wenlun Nr. 5/2008 vom November 2008

Arbeitspapiere für Wirtschaftsentwicklung/Working Paper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SSN-Nr. 1860-2207

Herausgeber: Prof. Dr. Jingbei Hu

Redaktion: Prof. Dr. Jingbei Hu

Verlag: Verlag China Translation Bonn

Druck: Deutsche-Bank-Lehrstuhl für Volkswirtschaftslehre

am Chinesisch-Deutschen Hochschulkolleg (CDHK), Shanghai, VR China

Jingji fazhan wenlun (Arbeitspapiere für Wirtschaftsentwicklung/Working Paper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st das offizielle Organ des Deutschen-Bank-Lehrstuhls für Volkswirtschaftslehre und des Instituts für Wirtschaftsentwicklung am CDHK

Internet-Adresse: www.hujingbei.net

E-Mail-Adresse: jbeihu@mail.tongji.edu.cn

Tel.: +86 (0)21 6598 0687

文章免费使用声明/Erklaerung der Freinutzung/Declaration on free use:

本文论所发表的文章，可以由使用者免费用于非商业性用途尤其是学术研究。

Alle Papiere, die in dieser Reihe erschienen, koennen fuer eine nicht-kommerziale Nutzung und besonders fuer akademische Forschungen frei verwendet werden.

All papers appearing in this series can be used freely for non-commercial uses and particularly for academic researches.
